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3 期

目 录

【专稿】

- 单少杰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展望篇）
——简述民主制国家与极权制国家的百年对峙

【域外见闻】

- 于向真 我眼中的新加坡（1）
——新加坡的衣食住行

【评论】

- 吴根耀 读《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后的疑虑
胡宗式 章铎
樊能廷的逻辑与文风
——简评《对〈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几点考证》
王复兴
北大文革史应该怎样写——答樊能廷先生

【读书】

- 方延曦 刘家驹遗著读后——《光荣的背后》启示录

【述往】

- 安希孟散文两篇
1. 我参与过抄家偷书
2. 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文摘】

- 张显扬 请为“人性论”平反摘帽
——从毛泽东怎样批判“人性论”说起

【读者来信】

- 张晓良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展望篇）

——简述民主制国家与极权制国家的百年对峙

单少杰

四、展望（上）

在过去一百年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已相继发生过三次全球性大战，三次由诸多民主制国家结盟以围剿某些集权制国家的全球性大战，其间包括两次全球性“热战”和一次全球性“冷战”。那么，在未来的一些年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还有无可能再发生这种全球性大战，这种或为“热战”或为“冷战”的全球性大战？

若无可能，则无需赘言。若有可能，便引出一个问题：即正处在快速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或正处在所谓“某某新时代”招牌下的中国，将以何种国家角色置身于这种全球性大战：是作为民主制国家试图要拉拢的集权制国家而置身于这种全球性大战呢？还是作为民主制国家试图要围堵的集权制国家而置身于这种全球性大战呢？

显然，这是一个有关冲突的问题，故是一个需要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互动才能发生的问题，或说是一个需要左右两个巴掌相互拍击才能拍响的问题；而其间一个巴掌便是当下一些民主制国家，另一个巴掌则是当下中国。也正因此，这个问题还可以拆分为两个分问题，两个从一正一反不同维度切入的分问题：

其一，当下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国家，其中包括那些已经历过前三次全球性大战的老牌民主制国家（即美、英、法、加、澳等国），以及那些由老牌集权制国家（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转型而来的后发民主制国家（即德、意、日等国）。究竟是要把当下中国当作他们试图要竭力拉拢的权益性盟友呢？还是要把当下中国当作他们试图要严加防范乃至大加围堵的集权制国家呢？

其二，当下正处于歧路彷徨的中国，也就是正面临着或向前走（即不仅要继续推进经济改革，还要真正启动政治改革）或向后转（即不仅要转而做强做大国有经济，还要在继续加强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再进而大搞“定于一尊”的个

人集权）这一抉择的中国，究竟是越来越开放以至成为许多民主制国家竭力要接近乃至要融入的从良型的国家呢？还是越来越保守以至成为许多民主制国家竭力要防范乃至要围堵的集权制的国家呢？

上述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那些国际关系，虽然都还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都还有着各种演变的可能性，故而还很难从中推证出那种非常确定的结论，但仍可以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而从中看出某种相对清晰的景象：

就前一个分问题来看，当下一些民主制国家特别是其中那个曾作为“带头大哥”的美国，的确已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当作他们要严加防范的头号目标国，甚至当作他们要联合其他民主制国家予以大力围堵的头号目标国。

就后一个分问题来看，当下中国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某某某新时代”中国，的确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越来越集权，同时还变得越来越张扬，似乎生怕其他国家不知道这一变化，并因此而越来越招致许多民主制国家予以猜忌乃至予以敌视，进而成为他们严加防范乃至大力围堵的头号目标国。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哈德森研究所发表长篇演讲。¹他在演讲中指控中国正在对美国大搞渗透性扩张：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在此刻，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

——“北京指导其工业官员和商界以任何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要求很多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交出他们的商业秘密”。

——“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安全机构掌握了大量窃取美国科技的能力——包括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使用这些偷窃的技术，中共正大规模地化犁为剑。”

——“北京如今要求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合资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他们所说的‘党组织’，让共产党在雇人和投资决策上拥有发言权甚至否决权。”

——“最恶劣的是，中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行动，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2018 年选举和 2020 年总统选举前的环境”“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干涉美国的民主运作。”

——“北京慷慨地向大学、智库和学者提供资金”“中共试图破坏美国今

¹ 引自《彭斯副总统有关美国政府中国政策讲话（2018.10.4）》，中文版见美国之音官网（<https://www.voachinese.com/>），英文版见白宫官网（<https://www.whitehouse.gov/>）。

天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北京经常性地要求好莱坞严格地正面描绘中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如今在美国 30 多个电台播放对北京友好的节目”
“中国最高领导人视察这家电视网络总部时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可是，中共却“封锁美国媒体机构的网站”，并刁难我们的记者。

——“通过‘中国制造 2025’，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全世界 90% 的最先进的工业，包括机器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

——“中国用所谓的‘债务外交’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的军费是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北京将在陆海空乃至外太空抗衡美国军力作为首要任务”，欲“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

——“尽管中国领导人 2015 年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他的国家‘无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今天，在人工建造的岛屿上的军事基地里，北京部署了先进的反舰和防空导弹。”

彭斯还指控中国对国内大搞专制性统治：

——在“让自己的人民迈向更大的自由”方面，中国已出现急剧倒退，即“朝着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的方向急转弯。”

——“中国已经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监控国家，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具侵入性，而且经常是在美国技术的帮助之下”，其“‘防火长城’也筑得越来越高，严重限制着中国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

——“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经受新一波迫害浪潮的冲击”，如“拆毁十字架、焚烧圣经、监禁信徒。”

纵观世界历史，对内实行专制与对外进行扩张，可以说是那种作“有害崛起”的集权制国家所拥有的“两大标配性特征”。因此，彭斯对中国作上述两方面指控，可以看作他正试图给中国作国家定位：一个既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又对国际社会虎视眈眈的集权制国家。

基于上述指控，彭斯宣布美国将对中国“展开决定性回击”：

——美国将“落实针对 2500 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最高额的关税特别对准了北京试图占领和控制的先进产业。”

——“我们将继续要求与中国建立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我们将要求北京打破贸易壁垒，履行义务，全面开放经济。”

——“我们将继续对北京采取行动，直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永远消失。”

——“我们最近加强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我们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

——“当涉及北京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恶意影响和干涉时，我们将继续揭露它”；并下令在美国的中国官媒“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更多的记者报道真相，不用恐惧也没有偏袒，深入挖掘中国如何干涉我们社会以及背后原因。”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大声疾呼，捍卫学术自由，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智库也在鼓足勇气拒绝中国政府的容易钱。”

——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我们国家利益的要求下，继续飞行、航行和运作。”

彭斯还宣布美国将启动国际合作来反制中国：

——“为了推进我们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我们正在与从印度到萨摩亚等整个地区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新纽带。”

——“我们正在精简国际发展和金融项目。我们将给外国一个公正、透明的选择，以取代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

——“我将有幸代表美国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东盟峰会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的亚太经合论坛。在那里，我们将公布新的措施和计划，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从上述演讲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任美国副总统对中国抱有非常负面乃至非常敌对的情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情绪，并不是很孤立地显露在彭斯的上述演讲中，而是较广泛地存在于美国的各类人群中。彭斯的演讲有一定代表性，或有一定民意基础。

上述以彭斯为代表的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抱有的负面情绪，笔者在远离美国的北京也都能屡屡感受到。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有位刚从美国回京探亲的美籍华裔

学者告诉大家：近些年来尤其是今春以来，她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人，其中就有一些她很熟悉的美国人，也都开始改变立场，开始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她还强调，这一变化是她此前从未遇到过的。这位华裔学者已留美三十多年。

年份？10 月 4 日（也就是上述彭斯在华盛顿哈德森研究所发表演讲的那一天），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笔者见到一位数月前从美国回京探亲的前中央某部委官员。他说得更加直白：在现今美国，不论是左、中、右各个阵营，还是上、中、下各个阶层，都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都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很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采取那些打压中国的政策，并不仅仅反映出他个人对中国所抱有的敌视和厌恶，也反映出许多美国民众对中国所抱有的敌视和厌恶，故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10 月 21 日，在另一次朋友聚会中，有位刚从美国访学归来的中国当代史专家告诉大家：在美期间，他到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人，比如见过曾撰写《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等名著的傅高义先生。他有些诧异地发现，许多美国人都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已在许多方面都倒退了，比如傅高义先生就认为中国已在许多方面都偏离了邓小平路线。最后，这位朋友还用了两个都带有“惊人”一词的句式，来概括他此次赴美访学的“总体观感”：

一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美国社会表现出“惊人的对立”，即被撕裂开来，一边是以民主党和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偏左阵营，另一边则是以共和党 and 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偏右阵营，两边势同水火。

二是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社会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即都持同一立场，不论是偏左阵营，还是偏右阵营，都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都支持特朗普总统对华采取很强硬的政策。

这位访美朋友所概括出的这一“总体观感”，还可以从美国总统所做的一件“例行公事”中，获得最直接且最权威的佐证。

2019 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当他谈到本届政府在有关医保、移民等方面的施政举措时，共和党议员给予鼓掌，民主党议员则拒绝鼓掌，表现出“惊人的对立”。而当他谈到本届政府在有关如何制裁中国这方面的施政举措时，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不约而同地给予鼓掌；准确地说，

都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给予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可谓“同仇敌忾”。

如今，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已成了一个很负面的国家，并因此而成了一个必须要防范乃至要打压的国家。那么，他们为何要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很负面的国家呢？有哪些理由呢？这一问题不难回答，其答案就存在于他们对中国政府所做的种种批评中：

例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不讲信用，比如不愿切实履行自己在签署 WTO 协定时所做的诸多承诺，公然背信乃至诓骗其他签约国。

又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不讲公平，比如不愿对等开放许多重要领域，只想让中国相关机构到美国去开银行和办媒体，而不许美国相关机构到中国来开银行和办媒体。

又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不尊重知识产权，比如在其治下频频发生各种侵害知识产权的案件，或是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件，或是强迫转让知识产权的案件。

又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不尊重基本人权，比如在其治下频频发生各种侵害基本人权的事件，或是打压维权律师的事件，或是打压政治异见人士的事件。

又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表里不一，搞官民有别：一方面公开煽动治下民众仇恨美国，或是向他们渲染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或是向他们渲染美国要存心打压中国；另一方面又私下任由其自家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亲近美国，或是任由他们把其子女送到美国读书和工作，即无异于主动去接受该国和平演变，或是任由他们把其财富送到美国藏匿和经营，即无异于主动去增加该国财富存量。

网上曾传过一个据传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的段子，其大意是说，中美两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中美两国的老百姓都可公开批评美国政府，二是中美两国的有钱人都会选择居住美国。这个段子以非常简约的方式讥讽中国政府和中国高官有两大毛病：一是非常专制，只许老百姓公开批评别国政府而不许老百姓公开批评本国政府；二是非常虚伪，明面上鼓动别人去反对美国而暗地里任由自己去亲近美国，比如任由自己用贪腐所得在美国购置豪华住所。

又如，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前后不一，前倨后恭：先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很是犯横，频频放出狠话，声言中国人不怕邪，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不惜为此一

战，“厉害了我的国”；继又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很是犯怵，屡屡讲些软话，表示有话好商量，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承认中方的确有问题，并承诺通过“深化改革”来予以改正。

无庸讳言，或说是“地球人都知道”，近年来中美贸易谈判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对等的谈判：先是在美方不断指责和威逼下，中方不得不坐上那张很不对等的谈判桌，那张显然是中方坐次席而美方坐主席的谈判桌；继又在美方不断要价和耍泼下，中方不得不面对那个很不对等的谈判协定，那个显然是中方让步远多于美方让步的谈判协定。

简而言之，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眼里，昔日的堂堂中国如今已成了一个有着许多不良品行的低端国家。也正因此，他们已将中国视作美国的一个颇为负面的竞争对手，一个虽在 GDP 上与美国相差不远但在价值观上与美国相差甚远的竞争对手，一个不仅不值得美国予以尊重反而会激使美国予以防范乃至打压的竞争对手。

2018 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被看作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帮助的国家，如为中国提供了最大份额的海外市场，如为中国培养了最高质量和最多数量的科技人才和财经人才，如此等等。但到了近些年，美国又被看作是对中国后续发展最有威胁的国家，不仅在实际利益上屡出重拳地伤害中国，而且在国家颜面上肆无忌惮地羞辱中国。

2019 年，正值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中，近一些年也就是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这一些年，可以说是中国最不受美国朝野各方尊重的时期，即中国最常被美国朝野各方当作负面国家来予以指责乃至予以嘲弄的时期；或者说是美国对中国观感最为负面的时期，即美国对中国最心存戒心且最心存藐视的时期。

人们也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的中国对美外交工作可以说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全面溃败的，即已无法有效遏制至少无法有效减缓中美两国关系日显下滑的这一趋势，或说是美方日显强势而中方日显弱势且日显受辱的这一趋势。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并不只想单凭其一国来对抗中国，而是还想召集其他许多国家来围堵中国，尤其还想召集其他许多民主制国家来围堵当今世界最大

集权制国家，即 GDP 排名已是世界第二但国家体制仍为一党专政的中国。可见，今日美国似乎还想再次上演那种昔日大戏，那种由诸多民主制国家结盟以围殴集权制国家的昔日大戏。¹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只是在华盛顿哈德森研究所发表反中演讲，告诫美国人民要警惕中国正在危害美国；还远赴巴布新几内亚 APEC 会议发表反中演讲，并且是当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发表反中演讲（已近乎指着后者的鼻子大声呵斥），告诫亚太国家要警惕中国正在危害国际社会：²

——中国搞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设置“巨大的壁垒”，收取“高额的关税”，采用“配额、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补贴”等手法，并因此在“去年一年”便给美国造成“3,750 亿美元的产品贸易逆差”。

——中国还搞不透明的债务外交。“他们所支持的项目往往是不可持续且质量低劣的”，并“有可能损害”债务国的“主权”；他们所搞的一带一路，也不过是“一个约束性的地带或一条单向的道路”。

——中国仍属集权制国家，而“剥夺本国人民权利的政府往往也会侵犯其邻国的权利”；为此，美国呼吁要维护“言论自由、私人财产以及宗教自由”，要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因特网”“让每一个人都能行使天赋的自由，追求自己的梦想，规划自己的未来。”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也在其频频外访中，不断游说其所到国家要防范中国，因为该国崇尚专制与集权而敌视自由与民主，并在国际交往中大搞扩张活动，比如在南海海域竭力加强岛礁军事化，比如在一带一路竭力输出中国影响力，比如在高科技领域竭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 计划”，即计划中国制造在 2025 年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无论是彭斯在 APEC 会议上大声疾呼，还是彭佩奥在周游列国中四处游说，都是在邀约诸多国家与美国一起来围堵中国，围堵这个正迅猛崛起的集权制国家。这就有些类似美国曾多次做过的那种举动，那种联合诸多国家以对抗某些正迅猛崛起的集权制国家的举动。

¹ 现今许多有关围堵中国的报道常提到“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即由美、英、加、澳、新等五国共同组建的情报机构。这一组织虽正式成立于二战后，但其五国都共同携手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等三次全球性大战，故可称之为世界民主制国家阵营中最为铁杆的传统盟友。在此次对中国的围堵中，这五国又走到了一起，并又都走在了前面。

² 引自：《副总统彭斯在 2018 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上发表讲话（2018.11.19）》，载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china.usembassy-china.org.cn)。

不过，今日美国已很难与昔日美国相比，既很难与二战时期的美国相比，也很难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可比。因为，今日美国的道义感召力已远不及昔日美国的道义感召力，既远不及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的道义感召力，也远不及里根时期的美国的道义感召力。

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即把美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为此不惜与其他国家发生各种争执，或为相互撕扯故而品相有点难看的各种争执，或为锱铢必较故而品味有点低下的各种争执；甚至还为此不惜背弃美国曾郑重做过的国际承诺，或是毁弃美国曾主持签署的国际条约，或是退出美国曾主持创建的国际组织。

因此，所谓“美国优先”政策，似乎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政策或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政策，有些类似“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曾竭力反对的那种主张“美国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

毋庸置疑，实施特朗普这一政策的最终结果，将会大大有损美国曾拥有的那种国家形象，那种曾作为自由民主灯塔的国家形象，并因此而大大削弱美国曾拥有的那种道义感召力，那种曾做到振臂一呼而响应者众的道义感召力。也正因此，美国将变身为某种“强邻国家”，某种动辄就打压一下相邻国家的“强邻国家”，并因此而很难再作为那种“领袖国家”，那种曾能感召许多国家或为之摇旗呐喊或为之赤膊上阵的“领袖国家。”

也正因此，当此次美国呼吁国际社会围堵中国时，有相当多国家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积极跟进，而是有点左右逢源地应付着两大当事国：一边附和着美国说，的确要坚持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的确要遏制一下中国不断显露的扩张欲；一边又附和着中国说，的确要发展该国与中国的传统友谊，的确要分享一些中国不断溢出的发展红利。

例如，在美国力主围堵“一带一路”项目上，就有相当多国家未能积极跟进。这其中既包括许多中小国家，也包括一些 G7 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英国。当然，这些国家之所以未能积极跟进美国，主要是因为觉着自己兴许能从这一项目中获得某种好处：或是获得更好的通商条件，如更好的交通设施；或是获得更多的中国援助，如更多的优惠贷款。

又如，在美国力主围堵“华为 5G”项目时，也有相当多国家未能即时跟进。

这其中既包括欧盟最大国家德国，也包括美国最铁盟友英国。前者曾一度表示原则上同意华为公司参加该国 5G 项目竞标，后者也曾一度表示有条件允准华为公司参加该国 5G 项目建设。这些国家之所以未能即时跟进美国，也主要是因为觉着自己兴许能从这一项目中获得某种好处：或是获得较实惠的 5G 产品，如比其他同类产品更具有价格优势；或是获得较实惠的其他好处，如中国政府通过其他方式给予额外补偿。

不过，若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真的要发生那种基于价值理念的重大冲突，即那种基于集权理念与基于民主理念的重大冲突，或是具有“冷战”形式的重大冲突，或是具有“热战”形式的重大冲突，那么，包括德国和英国在内的那些民主制国家，那些曾一度未能即时跟进美国的民主制国家，就一定还会站在美国一边，就一定还会加入到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个民主制国家阵营中，以遏制或围堵那个叫做中国的集权制国家，那个频频要给世界讲述所谓“中国故事”的集权制国家，那个频频要向世界提供所谓“中国方案”的集权制国家。■

【域外见闻】

我眼中的新加坡（1）

—— 新加坡的衣食住行

于向真

这里以我个人视角，谈谈我眼中新加坡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

衣：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北纬一度，不分四季，终年为夏。白天最高气温 32 到 34 度，夜间 24 到 27 度，人们外出短衣短裤裙子简单夏装，人字拖随处可见，个个整洁干净，衣服每天换洗，职场上和公司白领的服装一律熨烫得平平整整。新来的北方移民容易被当地人嘲笑的习惯是“一天才冲一次凉”，当地人包括菲佣每天都洗两三次澡，在坡多年，即便在摩肩接踵的热闹地方，我从来没闻到过一丝汗味。

我的专业是少儿科普，1983 年考电大最热那年我获得北京市历史地理单科第一名，可以说天文地理知识还可以，以前我认为赤道地区气温最高，新加坡刚好在北纬一度临近赤道，却不酷热，全球最热地方其实在回归线附近的副热带地区。2017 年 8 月，曾有两天气温高达 36℃，我到楼下游泳，当地朋友姚

大姐叹息“太热了，活不成了！”我笑道“北京夏季动不动高温 40C°，还没有这里的徐徐海风，也得活呢。”姚大姐对 40 度高温还没风表示无法理解。

新加坡是多民族国家，小区里、大街上有各具特色的服装。新加坡每年 7 月 21 日是种族和谐日，那一天所有小朋友都穿本民族传统服装，我参加过我小孙孙幼儿园的种族和谐日庆祝活动，我小孙穿着从淘宝网购海运过来的对襟汉服，小朋友们各自穿着印度、马来、朝鲜、欧洲各种族节日服装，幼儿园准备了华、印、马来和西餐四种风味食品款待大家。

说了人的衣装，再说说城市的外衣。新加坡号称花园城市，名不虚传，城市建筑多姿多彩，争奇斗异。房屋整洁漂亮，看不到任何年久失修的痕迹，40 年左右的祖屋和公寓正被逐步拆掉重建，除了被保护的名胜古迹和私人房产，似乎已不存在老房。

我特别喜欢小坡大街两旁枝繁叶茂、树冠硕大的景观树，最常见的是雨树，雨树是我走遍中国、看过 30 多个国家后感觉最棒的街景树。雨树是 19 世纪从南美洲引进的，20 多米高、枝杈蜿蜒的大树把道路遮护成隧道一般。新加坡目前拥有 4、5 百种树木，听说还在从全球引进名贵树种。各种树在小岛上各司其职，雨树护卫主干道，两旁人行路旁有各种十多米高的树，为行人遮阳避雨。

街道旁、住宅区的鲜花和水果令人目不暇接，今年 3、4 月份疫情初起，新加坡幼儿园暂时关闭，我每天早晨带小孙孙外出散步，在住家毗邻的别墅区晒太阳，有一次边溜达边教孩子认识水果和花名，转一圈 40 分钟，仅水果植株我就辨识出 17 种，香蕉、椰子、芒果、菠萝蜜、人心果、酸柑、柚子、菠萝、紫桑葚等，许多果实伸手可及，煞是可人。

小坡面积仅相当于京城五环内大小，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却养护保存了众多绿地与蓄水池，不仅增添城市景观之美，也净化空气，使整座城市疏密有致雍容典雅，犹如一个微笑着的盛装司仪，人见人爱！

食：号称美食天堂，确实名不虚传。吃货在小坡格外有福，全球美食云集于此，往来马六甲的货船日夜穿梭排着长龙，各国商船途径此地卖些特产就够小坡人大饱口福了。市场长年不断卖的冰鲜挪威三文鱼，一整条才 35 新元，好大一条呢，还免费收拾干净并分部位打包好。

这里许多人常年家里不开伙，街上到处都有食阁，任凭你住在边边角角的

地方，步行几分钟、最多一刻钟就有至少一个大商厦，商厦与邻里中心有福建、广东、马来、印度、日本、台湾、西餐各色风味饭馆。食阁更是物美价廉，一荤两素加米饭才不到 3 元，合人民币 15 元以下，寻常吃顿饭仅 3-6 元，于是很多人不在家做饭，食阁里各种好吃的换着样吃就很好。入乡随俗，我们周末也偷个懒儿，到外面换着口味吃。

平日我和老伴儿习惯在家做饭，食材从附近大超市和食品加工批发大楼购买。新加坡有亚洲物价最高的名声，对比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这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确实高。但品种超多，可供选择，政府有硬性规定，超市必须提供最基本的低价食品，比如 600 克的主食大面包每个 1.15 元，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进口的 1000 毫升盒装牛奶 1.7 元一盒，现烤现买多种口味的烤鸡 5 元左右一只，比北京同类食品便宜。我们在食品批发站采买 5 公斤上好的肋排 43 元，2 公斤袋装的去骨鸡腿肉 6 元，在北京真的买不到。

新加坡最著名的十大美食中，广受欢迎的是辣椒螃蟹、肉骨茶、海南鸡饭、麦片虾等。我爱吃的高纯度巧克力、乳酪、冰淇淋等，在北京属于奢侈品售价很高，在小坡属于一般食品，我舍得经常吃。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早年间没有自来水，华人在聚居地用牛车运水，唐人街被称为牛车水。牛车水是新加坡最热闹之处，中华各地名吃汇集于此，170 多个美食摊位大多是二三代老字号，吸引着全球游客和本地人来大快朵颐！

住：前边说过，新加坡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自己的住房。小坡民房大致有三种：祖屋、公寓、别墅。最多是祖屋，全岛到处可见没有院墙隔离的民居大楼是祖屋，祖屋越来越高大上，不仅外观漂亮，地理环境也相当好。除了不设隔离墙，祖屋还有个特点就是一层很少有住户，都是开放性通透的，便于穿行，也便于遮阳避雨防潮。公交车站与祖屋、公寓之间有带顶棚的长廊相连，忘带雨伞、烈日当头都没关系；别墅区没有长廊，因别墅住户都有私家车。

现在的新加坡女总统哈莉玛一大家人也住祖屋，她两年前当选总统后，按规定才暂住总统府。总理李显龙常住宏茂桥，据说也是祖屋，新加坡本地人结婚前都买一套政府优惠的祖屋，有条件再考虑公寓，发达者再购买别墅。我儿子有个同事家住宏茂桥，每天晨练，跑步途中时常遇到李显龙，李显龙坚持跑步早不是新闻了，李在祖屋区颇有些底层务工的朋友，邻居们在食阁买饭排队、

大选日排队投票都能遇到他，他和大家一样规规矩矩排队。晨练遇到总理会怎样？我儿子同事说“大家遇到李显龙只是随意打个招呼，没见有人格外兴奋的模样。有一次与李近距离一起跑，我问他‘可以和您拍张合影吗？’，‘可以啊。’就用手机合了个影。”一国元首不担心安全吗？我儿子同事说李总理跑步时“身后不远处有个配枪的保镖”。

祖屋区有灯光篮球场、众多的健身设施和儿童游戏场。我的好友秀芝住在祖屋，她请我去家里做客，她家南北通透，有穿堂风，厨房很大，兼做饭厅，秀芝家拐弯灶台对面摆着大餐桌和六把椅子，很舒适的居家。

新加坡政府有周祥的明文规则，什么人可以买祖屋？收入低于多少的人能享受哪些优惠？什么人有权资格买新建祖屋？比如只有公民才能低价买政府祖屋期房，绿卡持有者可以买二手祖屋；再比如子女购买与父母相邻的祖屋能享受可观的优惠额度，以此鼓励子女就近照顾老人。

我看到祖屋区停着许多名车好车，一打听，高收入的人（只要是公民，购买第一套住房时名下不拥有别墅或公寓）都可以买祖屋。购买祖屋有详细条款，针对各种弱势人群、低收入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减免，我听说最便宜的一套祖屋，三两万新币或更低就可以买下来，贷款利率也很低，难怪拥房率全球最高。

第二种是公寓，特征是一组带围墙的楼房，有齐备的物业服务，不另收费的停车位，有免费的健身、游泳、网球场等公用设施。

第三种是别墅，分独栋与联排别墅，所有别墅主人买房时就拥有了永久地契，那块地连同上面的建筑都是自家私有财产了。

有恒产者有恒心，小坡人没闹革命没走弯路，实现了大众安居乐业。

行：按说小岛上常住人口多达 570 多万，人口密度非常高，但住下后我并不感觉拥挤。闹市区也鲜有堵车现象，儿子告诉我小坡的“道路设计为网格化，便于车辆随时改道，就不会像北京那样一堵一整条街，甚至整个环线。”岛上最核心、最容易堵车的一条道路是收费的，但无需停车，正常驶过被刷卡扣钱，不想交费，稍微绕个路就过去了。

新加坡鼓励公交出行，地铁和公交大巴四通八达，票价低廉，如果你先坐地铁出站半小时内改乘大巴，或者坐了大巴换乘地铁，后面车资极低廉，公交收费即优惠又平衡全局。在新加坡买私家车，车并不贵，拥车费相当高，名副

其实的鼓励公交出行。无论地铁还是大巴，发车间隔短而固定，我没遇见过拥挤现象，每次上车我都有座位，偶尔没空位会有男士或年轻人马上让座。

小坡公路交通标识设计的很好，我家院门前那条街约两公里长，有 10 个红绿灯路口，每处红绿灯通行的间隔被设计得都不一样，最左边丁字路口，有重型卡车通过的 8 车道，红灯时长 30 秒；其他是 6 车道，第五个路口正对一所小学校，间隔时间也是 30 秒，为照顾低年级小学生过马路；第六个路口是我最经常通过的，我第二次来坡时，发现这个路口每次通行的倒计时从原来的 17 秒增加到 20 秒，通过时更从容一些；第七个路口正对地铁站，是整条街通行最频繁处，所以间隔很短，通道最宽，赶乘地铁的人不用久等，人多时也不拥挤。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细节与时俱进的调整，对我而言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高水准。

另外，不设红绿灯的路口会有一根黄黑相间、顶部一盏圆灯的灯柱，它表示“行人优先”，车必须让人，司机不得莽撞，自觉礼让行人。我在北京习惯了人让车，2015 年去杭州时发现杭州的汽车司机普遍懂得让行人先走，挺感动的，为此给杭州加分。到小坡后习惯了快速走过，客气只会耽误时间，司机一定停下让我先通过。

新加坡作为全球海运航运枢纽，港口和樟宜机场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上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前三名：2004 年香港第一、新加坡第二、上海第三；2008 年新加坡第一，香港第二，上海第三；2012 年上海第一，新加坡第二，深圳第三（香港落后了）；到了 2019 年上海第一，新加坡第二，宁波第三，香港已退出国际必备港序列。新加坡港作为世界第二繁忙的集装箱港口，设备设施先进完善，为往来船只提供最便捷的服务，2019 年完成 3720 万集装箱运量，完成 6.262 亿吨货物吞吐量。小坡有多个海滨公园，都是不收门票开放式的休闲健身好去处，马六甲东出口的港口岸边是东海岸公园，周末我和家人去那里放过几次风筝，港口日夜停泊着排成长龙的各式大船，夜色降临一连串魔幻般的璀璨灯光美轮美奂。

来坡初期，我和当地老华侨聊天时感叹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方得天时地利人和，老华侨纠正我的说法，告诉我建国初期在李光耀带领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55 年前还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装备，基本靠人工潜海挖泥清淤，奋斗

多年开创出最优良的港口。为此，新加坡长期以来优待“建国一代”，比如大超市每周三对老年人减免购物款等，也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吧。

樟宜机场连续多年在世界最佳机场排名中荣获冠军，并在“最佳休闲设施机场”奖评选中夺冠，其中电影院、游泳池、音乐酒吧、午睡休息区及航站楼内的过境酒店几项得分遥遥领先。要在新加坡机场过夜很简单，找个舒服的沙发躺下就可以了。我对樟宜机场的最佳印象是快速便捷，迅速登机便捷离去。四个航站楼上下飞机、存取行李都很方便，紧邻地铁站，让我想起在北京国际航站楼里拎着包、拉着箱走啊走，航站楼里要坐班车，外面没有公交车，乘专线地铁或大巴需另买高价票，相比之下樟宜机场设计太人性化了！

2019 年樟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为 6830 万人次，同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1 亿人次，成为继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后全球第二个年旅客吞吐量过亿的机场。中美是大国，小坡机场运客量紧随其后很了不起啦。

机场本是转机或中途停留的地方，但新加坡樟宜机场与众不同，这里的四座候机楼以及两年前落成的星耀樟宜，把新加坡机场打造成世界级的航空枢纽与振奋人心的时尚生活新地标，成为游客必到的景点，也是本地居民经常光顾的休闲胜地。星耀樟宜与 1 号航站楼抵境大厅无缝连接，从 2 号、3 号航站楼步行即可到达。

这座圆拱形建筑楼高 10 层，巧妙地把自然生态与人类巧思融为一体，中心景点是世界最大型的室内瀑布——40 米高的“雨漩涡”，在空中步行走道观赏种植有 2000 棵树木的森林谷和 1 万多平方米的屋顶花园，宛若徜徉云端。里面还有各种新奇游乐设施，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风味各异的美食店，一改人们对机场的定义。我儿子儿媳家离机场不算远，周末全家出动到星耀樟宜去遛娃游玩享受美食，每次都流连忘返。

要说小坡有哪些弱点，我找出两点：一是小，国土面积仅 724.4 平方公里，香港面积是 2754 平方公里，新加坡比香港小很多。新加坡周边共有 63 个岛，有几座是废塑料袋等垃圾填海的人造岛，这些小岛有些用于军事，有些用于旅游，有些用于炼油工业，最小的灯塔岛礁为航行服务。总之新加坡非常小，是世界上第十六小的国家，所以小坡不逞强，55 年埋头实干，跃升第一世界，并成为当今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二是有疫蚊，一种黑白花蚊子传播登革热病。其实新加坡蚊子密度不高，多数家庭并不需要安装纱窗，不少地区没有蚊子。我看到新加坡十分重视灭蚊，雇很多工人专职除草灭蚊，我家住的院子每周二、五两次全覆盖喷洒灭蚊药；政府定期派人入户查看家中是否有积水，也是为了灭蚊；听说小坡还用过生物灭蚊，从美国进口并投放了一批抑止繁殖的雄蚊。遗憾的是疫蚊太顽固，登革热延绵不绝，今年尤其严重。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 8 月 5 日公布，每周新增登革热病例连续 8 周超过 1000 例，今年已出现 22403 例登革热病例，超历史最高纪录。新冠疫情隔离措施使客工被隔离，公共区域疏于维护，加上雨水偏多，有助蚊虫滋生。今年因感染登革热病毒死亡人数已达 20 人，比新冠肺炎病死人数多。我见到政府陆续派发宣传单和防蚊剂，媒体也经常提醒大家防范蚊虫。

盼望疫情尽早彻底消散，下次我想说说新加坡的移民与疫情。再见！📷

【评论】

读《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后的疑虑

吴根耀

读完胡宗式、章铎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笔者原来的一些疑问得到了回答，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和忧虑，如实记于下，供全体北大学子和对北大问题感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参考。

所谓原来的疑问，指胡宗式、章铎（夫妇，两人的合作笔名为“古樟”，下文简称两人为“古樟”）在《我在文革漩涡中》的表现。2017 年，聂元梓出版了厚达 959 页的《我在文革漩涡中》，但聂本人的回忆仅占五分之二（这“五分之二”里还包括了赵建文、胡宗式、蓝绍江的文章，孙蓬一的检讨，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首长的讲话等），其他 20 多个作者写的文字占了五分之三。该书附录中收入的 13 篇文章，古樟就占了 7 篇；《我在文革漩涡中》（下面简称《我》）一书里，古樟写的篇幅占五分之一强四分之一弱。

这就令人产生了疑问：北大人普遍有较强的成名成家欲望（用个褒义词叫“事业心强”），退休（没有科研经费）后省吃俭用攒点钱就是为了交出版费（出书发文章）。《我》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古樟是写家，还在其它

回忆录和网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完全有可能自己出书甚至出几本书。为什么不但要帮聂元梓（对电脑一窍不通的 96 岁老妇女）去弄成《我在文革漩涡中》这本书，还要把自己的东西夹塞进去？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初步解释是：他们对自己写的文字能否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没有自信，故要夹塞在聂的书里；万一将来会遭到批判甚至否定，就去批判、否定聂元梓吧。

往深处想，上述解释就太肤浅了。胡宗式当年是“新北大公社”的动态组组长，是聂元梓的心腹、知情人和紧跟者，我却是个逍遥派——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聂元梓此时联络其最忠实的追随者同心协力，要弄出这样一本书，实际上是“托孤”之举。追随者们也心领神会，努力表现自己，争当“第二代掌门”。古樟当然是最有竞争力的：当年就掌握有大量聂元梓校文革的机密，现在又写过不少文章，何况还是夫妻双雄。在《我》书的编撰中，古樟的表现可圈可点，看来不是要图在《我》书上签个作者的名字，而是想在聂元梓身后站在聂的肩膀上有进一步的作为。

古樟果然不负聂元梓所托，也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抱负：2020 年 5 月编辑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约百万字。书中收集的是 66 年 5 月至 68 年 8 月间的文革原始资料，包括大字报、内部的“动态报”和“简报”、日记和首长讲话等等。上册有三辑：第一辑“文革初期的风波”（22 篇），第二辑“1967 年整风 向吴传启团伙开火”（14 篇），第三辑“陈伯达‘6·5 讲话’引发北大大动荡”（28 篇）。中册也是三辑：第一辑“王力、关锋倒台后的新动向”（7 篇），第二辑“‘二月逆流’问题再起波澜，宣传队进校”（12 篇），第三辑“《牛山丑史》，‘四人帮’倒台后的孙蓬一与聂元梓”（4 篇）。下册是首长讲话，其中第二辑是“毛泽东‘7·28’召见”，第一辑移植了 1967 年 10 月 31 日“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编的《毛主席的新北大》，第三辑包括了两部分，一是《毛主席的新北大》里没有收录的，如江青 66 年 7 月 26 日在北大东操场的讲话；二是 67 年 11 月及以后的首长讲话，如 68 年 3 月 24 日打倒“杨余傅”大会上的多位首长讲话，谢富治处理北大 3 月 29 日凌晨偷袭（武斗）事件的讲话¹等等。

对古樟的这些“原始资料”，笔者认为首先得指出其三个最主要的特性。

¹ 这是一个支持聂元梓挑起武斗的讲话。正是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对北大的武斗持不公正的处理态度，蒯大富才敢学聂元梓，在清华大学挑起武斗。

第一是绝大多数“资料”的不可信性，因为它们在一个疯狂的造反年代产生，是失去正常理智和判断力的人写的。北大学生不都是聪明人吗，怎么会“失智”和“失判”？首先因为有狂热的派性。只要一分派，两派的骨干都是派性情结派性思维（得势的一派尤甚）。因为派性闭锁了心窍，内心上就不愿意去接受客观的事实和正确的建议。即使你去看，也是戴着派性的有色眼镜看人，端着派性的哈哈镜照事。即使你想听，也是塞着派性的“过滤”耳塞在听，甚至是站在派性的“屏蔽”墙后，听到的只是一派的声音。中国不有“偏听偏信”的老话吗？只听一面之词，就分不清什么黑白是非了，只有派性利益。

其次是当时流行的“走极端”的思想方法。文革发动者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都是这种“走极端”思想方法的典型实例。林彪说文革是没有写进《毛选》的“毛选”，大家当然都要“活学活用”这“活”的“毛选”。本来就是派性思维，再叠加上“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凡是说话，务必说死，若要处事，绝对做绝。一点余地也没有，能让人“信”吗？

再次就是首长讲话和报刊社论的错误舆论导向。造反的那段时间，中央首长尤其是中央文革首长到处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讲；“两报一刊”则频频发表社论，为群众运动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当时的“动态报”“简报”之类的，以传播和落实首长指示为首要内容；写文章贴大字报，绝对以社论精神为指导。那时，首长讲话和报刊社论传达的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文革发动者的伟大战略部署。今天重读这些讲话社论，你不感到大部分是谎言连篇吗？你不认为许多内容是一个骗局紧套着一个骗局吗？江青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康生、谢富治等都被开除了党籍、骨灰驱出了八宝山。他们的话还能信吗？

最后就是文章的时代烙印。文革是个造神的时代，要造神就得让万千草根黎民都变成愚民，因为神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奴化教育如影随形般地与神化教育孪生。神州大地上有个万众敬仰的神，他的意志就是全体草根黎民的意志。各行业各单位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也各有自己的神，如北大就有个“老佛爷”。因为这个“佛”是文革发动者亲自树立的样板，（68年7月28日之前）大大小小的首长讲话，都是交口称赞她、支持她的，意思很

清楚，就是要北夫夫都按“佛”的口径说话，照“佛”的指示处事。

第二是这些“原始资料”的复杂性。文革确有“史无前例”的地方：它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的，且是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运动起来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的洪流。之所以“解放”要加引号，因为洪流的方向是文革发动者指出的，洪流的河道则由中央文件限定。如果我们把贴大字报写文章比作水流的话，那么，组成这股洪流的水流其实非常复杂。少数紧跟中央精神者，当然是勇进的激流。多数人是随波逐流或是顺应主流思潮的漂流。还有被称为“现行反革命言论”的逆流或漩涡，被称为“异端思潮”的支流，借这股洪流达到某些集团或群体利益的暗流或潜流，还有静观其变、事后才发声的滞流……简言之，那时候真是什么奇谈怪论、出格想法都可以写，有些其实与文革关系不大。

第三是有些“原始资料”其实“非原始”，如日记。《雷锋日记》出版以后，某些投机者和扒手发现了一条成名的“捷径”：写日记。他们的日记，通篇都是冠冕堂皇的假话，金光闪闪的空话，不着边际的大话。一旦这些所谓“日记”被领导发现甚至还能被媒体报道，马上树为标兵，评上模范，接着就是“更上一层楼”了。文革开始，抄家成风，“日记”成了抄家的主要对象——只要摘录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即可置人于死地。绝大多数人只能不再日记，敢记的（哪怕是偷着记），能不考虑可能的后果？

这百把万字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见下述），“原封不动”地印刷出版了。古樟既不介绍其产生背景和当时的反响，也不以今天的认识加以任何解释、点评、批注或按语。都是 50 多年前的事情，即使是当年的亲历者“老五届”，除了武斗和死人致残这些极端事件外，恐怕谁也记不清楚谁写了什么大字报又写了什么内容。你不给一点线索或提示启发和诱导别人去回忆，别人为什么、又怎样去回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呢？即使是当年“新北大公社”的人，因为没当过“动态组”组长，也未必有兴趣去回忆这些事，因为这些“原始资料”太不具可读性了。

笔者的第一个疑问是：明知没几个人会去读这些“原始资料”，古樟下那么大的力气编这么大一本书，是为什么呢？古樟自己声称：“这些原始资料，是我们还原北大文革真相的基础”。意思很清楚：古樟的这本书不是给别人看

的，是为自己书写北大的文革史用的；第一步是整理出这些“原始资料”来作为依据，第二步就是“还原北大的文革真相”。笔者的疑问是：凭当年大部分在“失智”“失判”情况下写的派性文字提供的事实，还有大多已沦为笑料的当年首长们的讲话（古樟的“原始资料”），你能据之还原出“真相”来？

当然，笔者毫不怀疑古樟能完成这部“还原北大文革真相”的著作，而且是一本大部头著作。细细琢磨《选编》的内容，笔者斗胆预测其“真相”可能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或称“板块”）。1）北大“社教”和第一张大字报“诞生”，（上册第一辑），这是聂元梓及其“核心圈”人物乐此不疲的经典题材，文章已从网上写到书里再写到网上了。2）“二月逆流”（中册第二辑），北京高校“北大派”与“师大派”的斗争。3）“反潘（梓年）吴（传启）”（上册第二辑）（当时的提法，因潘梓年已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这个《选编》中改称“吴传启团伙”），是反王、关的基础。4）北大整风，“新北大公社”分裂，陈伯达是罪魁祸首（上册第三辑）。5）抓捕和镇压“红旗飘”等反革命小集团（中册第三辑）。6）聂元梓是反王、关、戚的英雄（中册第一辑）。7）工/军宣队进校，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挨整（中册第二三辑），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聂、孙的庭审和判刑已是文革后多少年的事了，但古樟可能会加上这个“板块”，作为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有中央首长的讲话为支持，表明言之有据，论证充分。

古樟确实领着读者回忆了一遍北大的文革历程，遗憾的是仍然站在聂元梓的派性立场上，怀着派性情结以派性思维在那里老调重弹，旧曲再唱。固然，研究文革的基础是回忆，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反思，顾名思义，就是要“反”过来思考、回过头去想嘛！就是要多“反”问几个为什么嘛！你把聂元梓说过了多少遍的话还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地说，这叫“反思”吗？

限于篇幅，本文仅举一个实例说明反思北大文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聂元梓有一个观点并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曾深得“新北大公社”拥护，至今仍被某些人吹捧成“北大文革的亮点”，引以为傲且深信不疑。这个观点是：“反潘吴”是反王力、关锋的基础，是反左；陈伯达一直反对我们“反潘吴”；陈在“六五”讲话里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引出的重要结论是：陈的“六五”讲话¹是

¹ 其实，陈伯达在 1967 年 6 月 5 日有两次讲话：一次是清晨在北大的大饭厅，另一次是深夜至 6 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谢富治陪同）。这已得到聂派人士的确认（王复兴，2019，P218）。

造成“新北大公社”分裂的罪魁祸首。相信古樟的新著中仍持此观点。

今天反思当年聂元梓的“反潘吴”，要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陈伯达为什么“一直反对”？王、关自持在文革初期战功显赫，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唯江青之命是从，没怎么把陈伯达放在眼里，陈早就对他们不满。聂元梓真要反王、关，陈伯达应该高兴和支持啊！为什么要屡屡劝阻、（并代表江青及中央文革）一直反对呢？

“反潘吴”，始自67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在5月底6月初达到高潮。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夺北京市的权。陈伯达的“六五”大会堂讲话也把话说白了：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去北京掌权，去领导知识分子。陈的这个讲话得到相当一部分“新北大公社”人士的赞同，因为他们相信谢富治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毛泽东钦定的，聂元梓执意与谢争权是错误的，并以退出“公社”的实际行动对聂表示不满。

这是“反潘吴”表面上的错误，深层次的错误是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4月1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发表，表明文革运动进入了深揭狠批刘少奇的新阶段，那时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批刘”。但从全国的形势看，除京、沪等少数省市外，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一触即发甚至已经发生，根本没有心思去“批刘”。北大可是校文革一统天下的，又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文革样板，“批刘”肯定要一马当先，责无旁贷吧？偏偏你聂元梓把“批刘”的头等大事放在一边，去抓什么“摘桃派”“潘吴”！你说中央文革要不要生气、要不要发火？

不“批刘”却去“反潘吴”，还只是个“大方向错误”的问题。聂元梓不仅倾北大全校之力“反潘吴”，而且把北京高校“北大派”的十几所高校都组织进“反潘吴”的大军，连本来派性色彩不明显的清华蒯大富也误判为是“大方向”而加入了“反潘吴”的行列。这实际上已经踩到了红线：撇开中央文革小组，由聂元梓来领导北京高校的文革。陈伯达已把话挑明了：聂元梓、孙蓬

《聂元梓回忆录》里记载的是“六五”的大饭厅讲话；因为这个讲话戳到了聂的痛处，令聂老羞成怒，耿耿于怀。胡宗式身为动态组组长，当然在当时就知道陈伯达有两个“六五”讲话；作为聂的心腹，他当然也知道聂元梓忌讳的是那个“大饭厅讲话”。本来，“大饭厅讲话”是在北大讲给北大师生的，也直接地尖锐地指出了北大前阶段运动的问题，造成“新北大公社”分裂的导火线是“大饭厅讲话”，它应该是重要的甚至关键的“原始资料”吧？但这个讲话令聂元梓太难堪，老脸无处放。古樟在《选编》中收录了“大会堂讲话”却故意不收录“大饭厅讲话”，派性立场何等鲜明！凭这样偏面的材料，你能“还原北大文革真相”？

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我们夺权”，即夺中央文革对文革的领导权。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期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火线指挥所，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毛泽东号召草根黎民造反，却绝对不允许成立任何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一旦发现，立即取缔。为什么？因为一旦有这样的组织，就会与中央文革小组分庭抗礼，就会出现“政令二出”的局面。中央文革操控北京高校分成“天”“地”两派，但只有“派”没有“组织”（没有专职班子和办公地点）。为什么？有了组织，就多了一层领导，中央文革就不能直接调动了，甚至会出现“抗上”的情况。文化革命，只能由毛泽东亲自部署，江青及中央文革直接领导，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聂元梓不听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反复劝阻，坚持“反潘吴”，明显就是踩红线、要夺中央文革对文革的领导权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聂元梓第一次踩红线了。李雪峰检查自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之后，毛泽东派他到天津工作。聂元梓认为“打倒李雪峰”的机会来了，靠其聂氏家族的关系，动员华北局、山西乃至天津的造反派，三番五次去天津，要把李揪回华北局批斗，但每次都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李雪峰后担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逆中央文革而动，这不是踩红线吗？李雪峰的事还没“闹”完，聂元梓又来“闹”新的一出，要“反潘吴”。你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对之会怎么想？

综上述，聂元梓的“反潘吴”，只是她野心膨胀要夺北京市大权的一个幌子。“反潘吴”一开始就遭到江青和陈伯达劝阻和反对，聂元梓却一意孤行，“反潘吴”由“大方向错误”进一步恶化为“踩红线”、向中央文革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错误。

反思当年聂元梓的“反潘吴”，要反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陈伯达为什么会在6月5日对聂元梓提出警告式的严厉批评？不仅因为有“打倒李雪峰”这个实例在前，不仅因为6月1日聂元梓公布了第一批“潘吴”的材料，而且准备接着公布第二批、第三批“潘吴”的材料（据章铎，见王复兴，2018，P286），欲在全社会掀起“反潘吴”的高潮，不仅因为陈伯达在6月3日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孙蓬一，更因为江青实际上在6月1日以一个实际行动严厉地警告了聂元梓，但聂却浑然不觉，依然故我。

6月1日是什么日子？全中国的大学生都知道是毛泽东批发广播那张大字

报的日子。66 年的今天，毛泽东把那张大字报捧上了天，什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什么“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桂冠一顶接一顶。67 年 6 月 1 日，聂元梓当然要隆重纪念，大肆庆祝，籍此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聂广发请帖，邀天下英雄赴京聚首，请各路首长前来捧场。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中央文革不但没去一个首长，没去一个工作人员，连李讷这个刚跨出北大校门的校友也不回去看一眼。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天北京官方的舆论宣传上，竟然没有一个字报道北大纪念大字报广播发表一周年的庆祝大会。这不是江青对聂元梓的无声却严厉的警告吗？看来，聂元梓 67 年上半年的种种表现，不仅令江青大为不满，而且引起了江青的警觉：你夺权的手怎么伸到我这里来了？

江青的“六一”警告无效，只能陈伯达出面，而且一改往日苦口婆心的语气，变为警告和敲打——聂元梓的此风不煞停，中央文革的权威何在？陈的敲打，确实使部分“新北大公社”的人士醒悟。本来，3 月校文革整风，不少人对聂的文过饰非就十分不满。“倒谢”和“反潘吴”，促使聂的“核心圈”的内部矛盾加剧，导致“新北大”分裂。陈伯达的“六五”讲话只是“分裂”的导火线（或说“外因”），“分裂”的“内因”是聂当年的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等人相继离她而去。“外因”能成为“罪魁祸首”吗？

以上是读了《选编》后的疑问和笔者的部分解答。拙作题为“疑虑”，即“疑问”之后还有“忧虑”。忧虑来自古樟在“编者按”里的一段话：

毛泽东全程直接或间接操控北大文革运动，北京大学是文革的发源地，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弄清北京大学文革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了解北大文革中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利于对中国整个文革的认识和理解。

农民都知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你把北大文革的罪孽都推到毛泽东头上去了，那文革期间北大还有党的领导吗？比如说，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偷袭 31 楼学生宿舍，是谁在燕园临湖轩拍板决定的？是毛泽东？他 1918 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那时的北大在城里的沙滩。你古樟真有能耐让毛泽东穿越那么大的时空？！不说“全程”，仅拙作中提到的“揪李

雪峰”“倒谢（富治）”“反潘吴”和挑起武斗，哪一件事是毛泽东“直接或间接操控”的？

北大文革期间，没有一天缺失过党的领导。66 年 6 月 1 日晚广播那张大字报，张承先工作组连夜进驻，代行校党委职能，于 8 月初撤出。聂元梓校文革（即“文化革命委员会”，含筹委会阶段）于 66 年 7 月 28 日成立，是新生的权力机构，至 69 年 9 月 27 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才退出文革舞台。68 年 8 月 27 日，工/军宣队（全称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实际上是对北大实行了军管（校文革名存实亡）。校革委会成立后，工/军宣队继续留校领导“教育革命”。

既然文革期间北大有党的领导，而且一把手还是大人物，那么对北大的文革灾难和罪孽就难辞其咎。以武斗期间打入致死为例，打入凶手固然要负法律刑责；但他没有“报杀父夺妻灭门之仇”的杀人动机，而是在武斗背景下派性发作、人性沦丧的疯狂举动，挑起武斗、煽动派性者，同样要负法律责任。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当然要对文革罪恶负责。不过，67 年 8 月底开始，毛泽东号召大联合和解放干部，警告“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为的是能在 68 年春节结束文革。北大却在 68 年春节后武斗了，古樟能提出毛泽东挑起北大武斗的“直接或间接操控”的证据吗？按古樟的逻辑，中国所有的单位都可以把文革罪责推到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操控”上，那中国就只有一个且仅仅只有一个文革罪人了。法律上说得过去吗？老百姓能接受吗？老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找到毛泽东去申冤要债，不就成了“冤无头，债无主”了？

古樟尽管高喊要“还原北大文革真相”，也貌似“还原”地指出聂元梓在“社教”期间被批、在工/军宣队进校后挨整，却刻意回避了聂元梓执掌校文革的那两年多时间。古樟故意使了个“障眼法”，即故意把校文革屏障起来了。

（上文提到的陈伯达“六五”大饭厅讲话即是一例）。笔者的忧虑即在此：北大校文革的“原始资料”被古樟“故障”掉了，你凭什么去回忆和研究北大的文革？校文革毕竟是研究和反思北大文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进一步言，如果外省外单位也有这样的“古樟”，把该地该单位文革中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及其一把手“故障”掉了（如在山西的文革研究中“故（意屏）障”掉刘

格平和党的核心小组，在上海的文革研究中“故（意屏）障”掉徐景贤和市委写作组），那文革研究怎么开展和进行下去？既然古樟能出个大部头，别人也能写一堆“文革真相”出来，这样的“文革研究”又有什么意义？

回忆不是照相。相机摄在照片上的是局部范围内的客观实在，或叫真实（尽管对之可能有多种解释）。对文革的同一个题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忆，甚至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回忆。这取决于回忆者的立场和态度：有的人决心走出文革也基本上已经走出了文革，有的人希望走出文革但尚未完全走出文革，有的人可能至今仍在走出文革与留在文革之间徘徊，有的人则毕生留恋自己文革期间的“辉煌”而拒绝走出文革。拒绝走出文革的人即是脑子出了故障的人，他还是怀着派性情结，以派性思维来重复那些被派性扭曲甚至颠倒了的事实，并视为“文革真相”。古樟编这个《选编》，实际上是玩弄了一个大“故（意屏）障”法：力图屏障北大校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用他精心挑选的这些所谓“原始资料”误导读者相信他说的是“北大文革真相”。古樟的“故意屏障”法，大概还能“障”一时，但不能“障”永久；可能“障”部分人尤其是非北大文革亲历者，但不能“障”所有人尤其是北大文革亲历者。■

主要参考文献

胡宗式、章铎编. 2020.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华忆出版社.

聂元梓. 2005. 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聂元梓. 2017. 我在文革漩涡中. 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18.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香港：红色中国出版社.

王复兴主编. 2019.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 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评论】

樊能廷的逻辑与文风

——简评《对〈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几点考证》

胡宗式 章铎

作为北大文革的亲历者，面对谎言充斥的现状，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亲历的那段历史留下来。《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简称《选编》）的编辑出版，就是我们这种愿望的体现。

《记忆》281 期在【书评】栏目里刊登了数篇评论文章，其中樊能廷的《对〈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几点考证》一文（以下简称“樊文”）对《选编》提出了几点质疑。

一、关于 1967 年 1 月 3 日晚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樊能廷对《选编》提出的第一个质疑是：

地点都是人民大会堂，人物却有变换——

刊载于 1967 年 3 月 1 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四)》第 3 页开始的文本，是 2400 字。“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等同志接见了北大聂元梓、夏剑勇、姜同光、刘冲、于贵南等同志。”

到了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册第 38 页开始的文本，却只有 1800 余字。参加接见人员：陈伯达、江青、康生、杨成武等。北大代表：聂元梓、夏××等五位同志。

瞧瞧，接见人里边王力不见了，被接见人里边“夏剑勇、姜同光、刘冲、于贵南”不见了。胡宗式、章铎是否在刻意隐瞒什么？

众所周知，对于同一次接见，不同的人必定会有不同的记录，这和学生上课记笔记一样。樊能廷用不同版本的记录，质疑“胡宗式、章铎是否在刻意隐

瞒什么？”看来，樊博士的逻辑思维与正常人真的不一样！

二、关于“‘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这是“樊文”对《选编》提出的一个主要质疑。

“樊文”对“红旗飘里有坏人”这句话是句号还是问号，真是做足了文章。他的逻辑是问号就证明江青是肯定“红旗飘”，是句号就证明江青是否定“红旗飘”的。江青在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提到北大的“红旗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其讲话的意思也是明确的，不会因为句号还是问号就有相反的理解。江青还说：“牛辉林到处去抢、抄，是有人授命给他的，别人授命，要我就不授命。”樊博士怎么不对这一段话的真假好好考证一下呢？

“樊文”在附录4中对编者进行了恶意攻击：

《北斗星》版、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版、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版，三种版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中，都没有“‘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个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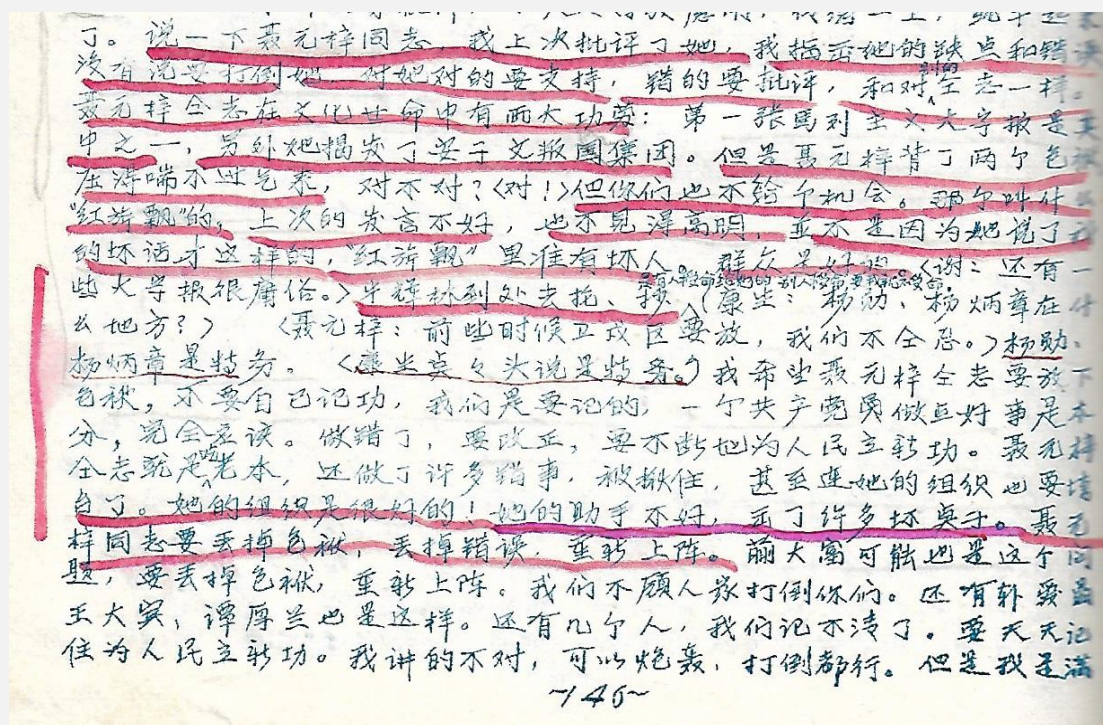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独独胡宗式、章铎把江青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死死扣定在牛辉林的头上。为他们设立“红旗飘”专案组，抓捕、设局诱捕“红旗飘”成员，非法关押，残酷逼供开脱责任。

胡宗式、章铎编造江青讲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至今还在竭力传播），其目的正是为他们“文革”期间一直借江青话语打压、陷害反对派的种种恶行开脱历史责任。

《选编》（下）第一辑《毛主席的新北大》，是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1967年11月出版的油印刊物，内容是1966年6月至1967年10月中央领导和其他负责人关于北大的讲话。为保持历史原貌，基本采取原排版的方式，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外，对原文不加更动。——这在封底的“本卷简介”中说得清清楚楚。其中樊能廷所引的《选编》“寥寥五十余字”那段话在原油印资料第146页，现抄录如下（文中加粗的部分就是“樊文”所指的“寥寥五十余字”——实为61个字）：

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批评了她，我指出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对的要支持，错的要批评，和对别的同志一样。聂元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大功劳：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但你们也不给个机会。那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是有人授命给他的，别人授命，要我就不授命。（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元梓：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自己记功，我们是要记的，一个共产党员做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正，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被揪住，甚至连她的组织也要垮台了。她的组织是很好的！她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

下图是原件的扫描件。图上显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



现在讨论的是 50 多年前的事，不会因为江青说了什么就定什么案，因此我

们对句号还是问号并不特别关注。樊先生还特别强调：

《北斗星》版、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版、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版，三种版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中，都没有“‘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个说法。

那么，“红旗飘”的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牛辉林遗孀唐竞女士在回忆文章中说，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推选周培源为核心组组长，“一周后，周培源辞去核心组组长并推荐牛辉林接任。上任一周，牛辉林就辞去了组长职务。原因是，9月1日，江青说‘红旗飘’里有坏人。他不想连累‘井冈山’。”¹

屈长江写道：“196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的群众组织《红旗飘》被江青点名。江青不仅在召集北京各大学群众组织的头头的大会上谗过于人，而且诬陷说“红旗飘”中有坏人，我们当时真的被弄晕菜了，把“红旗飘”全部成员及其家庭成分的名单托人递给中央文革，让他们指出坏人是谁。”²

无论是当时，还是数十年后写回忆文章，“红旗飘”的当事人自己都是相信有这句话的。

笔者相信，以樊先生当年在“井冈山”中的地位，大概不了解牛辉林辞去核心组组长一职的内情，也不会知道“红旗飘”这些人当初说了些什么。数十年后，他孜孜以求地考证江青有没有说过“‘红旗飘’里有坏人”那句话，意义何在？目的又是什么呢？

江青的这句话不是孤立地讲的，还有上下文。在这句话前面，江青还有一句话：“那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

显然，在这之前的某次会议上，牛辉林代表“红旗飘”发表过一番意见，江青对他的意见是否定的。牛辉林说了些什么？樊先生可否查证一下呢？

据江青这句话的后半句，她在1967年9月1日之前就知道牛辉林说了她的坏话。牛辉林何时何地说过江青的坏话，江青又是如何知道的，樊先生为什么

¹ 唐竞编：《怀念牛辉林》，第202页。

² 屈长江：《良知漫漶的岁月》，原载《燕园风云录》（四），后载于《记忆》第182期。

不考证一下呢？

在说了“‘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一句之后，江青还说了一句：“牛辉林到处去抢、抄，是有人授命给他的，别人授命，要我就不授命。”

“抢、抄”，显然是指砸抄校文革保卫组，“别人授命”，是批评陈伯达的。对此，樊先生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

当年，“红旗飘”确实是有问题的，屈长江证实，他们“陆陆续续地说出了一些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议论和怨言”。他们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都进行了攻击，这是毛泽东也知道的。“统统一笔勾销”的话，只有毛泽东可以说，别人是不能说，也不能做的。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和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指示，按照毛泽东批发的 8341 部队在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按照北京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处理从宽”是可以的，“一风吹”肯定不行。

据说，北大“井冈山”自己也在 1968 年 6 月把牛辉林看管起来了，真的吗？为什么？樊先生可否证实并解释此事？唐竞女士说，“仅在 1968 年 9 月至 12 月的三个月中，就对他（牛辉林）批斗了 100 多次。”¹ 这是军宣队、工宣队执政北大期间的情况。

1968 年 12 月 11 日，宣传队召开全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将“牛辉林现行反革命集团”七名学生揪上台，并宣布“牛辉林在隔离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那些批斗会的会场上，樊先生是否也像其他的与会者一样，举了拳头，喊了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樊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牛辉林等人说话。

对牛辉林的审查是在工军宣传队进校后才开始的，也是由宣传队定案的。屈长江回忆说：

我们被隔离审查时，并不太怕打和骂，也不太怕威逼和诱供。最扛不住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跟我们大讲阶级感情，讲出身，忆苦思甜。前面在缘起中说过，我们几个人不论是法律系还是政治系的，出身都是“红五类”。所以人家一讲到出身，一讲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我们一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

¹ 唐竞编：《怀念牛辉林》，第 202 页。

的，精神上就扛不住了。有一种要把一切都实实在在地交代出来的冲动和愧疚感。谁说中国只有乐感文化没有罪感文化？每当这个时刻，我们就像跪倒在上帝的面前，罪感深重，抬不起头来。

我大概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曾不止一次被这种忠诚和罪感压倒，背叛我们的“攻守同盟”，坦白出我们的“反动言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面对巨大压力没有屈服”云云，是不存在的。

樊先生特别强调谢静宜、迟群等人为牛辉林一案“一风吹”的事情，但同样是谢静宜和迟群，同样是 8341，为什么没过多久又把牛辉林等人打成“五一六”了呢？而且让他们在大会上公开承认，牛辉林等人也非常配合，真的在大会上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了。这一过程，屈长江写得很清楚：

记得 1971 年初春，已经毕业的我又被揪回北大，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当时对系里 8341 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的事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我和王忠林还找过迟群同志，问以后再搞运动整我们怎么办？迟群拍着胸脯承诺：十年之内，有人整你们，让他来找我！”领导说：“**那次是那次的政策，这次是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哑口无言。大约一两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校 8341 部队某个办公室里去训话。训话者是位女同志，三十来岁，军装，短发，不认识是谁。训话的神态，口气，总让我想到传说中的谢静宜。训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问我交代得怎么样了。我说，过去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她听了后怒斥道，这次要交代新问题，就是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说，我不记得有此事。她说，我们是 8341，你应该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们会把你大老远的弄来吗？！我们有实打实的把握和证据。我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你要准备一份坦白交代大会上的发言。记不记得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忆交代。先坦白交代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事。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能怀疑曾经为自己平过反的 8341 中央警卫团吗？我能怀疑这位可能是谢静宜的女领导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吗？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早已被几次隔离审查弄坏了的记忆力和脑袋了。于是，开大会那天，牛辉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

后，我就走向了会场的讲台。半路上转头一看，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同伙”纷纷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么又是我！第一个把自己绑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让我悔恨一辈子！

我中了“忠诚”和“信任”的圈套！

大约七八个月后，8341部队的王连龙政委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8341也搞逼供信！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记起来了，我参加的是《红旗飘》的红卫兵。”王政委嘿然不悦，脸拉得长长的，走了。

谢静宜、迟群、王连龙和8341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樊先生能否解释一下呢？他们为牛辉林案“一风吹”的把戏，还值得炫耀吗？

三、关于“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樊文”写道：到这个时候笔者才明白——“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这句话，出自戚本禹和陈伯达，而不是出自江青口中！

“樊文”借用扬子浪日记等材料，就说这句话“出自戚本禹和陈伯达，而不是出自江青口中！”作为考证，应当继续探明这句话到底出自戚本禹和陈伯达的哪一次讲话。但是，樊能廷没有这样做。然而，上面的扫描件中就有江青的这句话。江青对“红旗飘”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却不记得“新北大公社”这个名字，只说“她（聂元梓）的组织”。

据笔者所知，《人民日报》很早就归王力管辖，《人民日报》每天的大样，都要先送王力审查，王力签字后才能开印。1967年6月初，王力给《人民日报》临时编委小组打电话：不要刊登北大、清华的稿件，不登聂元梓、蒯大富、张本的稿子。《人民日报》社也有一些人是反对王、关、戚、吴传启一伙的，所以王力的这个电话也被北大知晓，后来写进了揭发关锋、王力的材料之中。关锋、王力垮台后，10月7日，陈伯达、戚本禹去《人民日报》社讲话，在《选编》（下）第228页就有他们的讲话（摘要），抄录如下：

伯达：北大两派的联合是困难的，他们是纲领不同，慢慢来，要搞真正的大联合。

戚本禹：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组织，革命性是很强的。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聂元梓的错误，保的是马列主义大字报。

伯达：我们都保嘛！……我现在也不同意周培源当校长了。……

他们讲话的目的是消除王力的影响。他们表态同江青一致，一点也不奇怪。同样，这次讲话也流传到北大。由于关锋、王力已经垮台，江青也公开发了话，对于陈伯达、戚本禹的这次内部讲话，北大领导层已经不感兴趣了。

对于樊博士的文风，我们早已领略。三年前，章铎在电子杂志《昨天》上看到樊博士在其大作中大量抄袭《陈一谔回忆录》的文字，曾对其提出批评。但樊博士不思悔改，反而狡辩一番。今又见樊博士对编者的种种恶意攻击，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能看到逻辑思维如此混乱的博士，也算是开眼界了。

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此别过。■

2020.10.3

【评论】

北大文革史应该怎样写？

——与樊能廷先生商榷

王复兴

樊能廷在其所著的《北大文革简史》（时代文献出版社）一书中，专辟一节指斥笔者的拙作《抢救记忆》（详见该书第八章第二节《王复兴〈抢救记忆〉史实指谬》），笔者怀抱着极大的希望拜读了樊文，本以为可以从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史料上的补益，但细读全文之后，却大失所望。

樊先生说：写史是“严肃”之事。但他的文章中却充满了仇视、攻击、谩骂，甚至是污辱人身之语。在他的笔下，有着七千多人的新北大公社的师生成了“变色龙”，孙蓬一成了“喙长三尺”的鸟类，《抢救记忆》的作者成了“爬秤钩”老鼠。对于非本派所写的文字，没有分析，没有考据，一律贬斥为“扭曲事实、遮蔽真相”“纵意捕风捉影、心理猜度”“编造故事”“谎话连篇”“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必受历史的唾骂。”写史要摆事实，讲道理，“论从史出”。而充溢其字里行间的，是阴暗、恶毒、仇视、偏激。其文风，其心理

仿佛文革时打派仗的大字报。试问，以偏见论史，以派性论史，以仇恨、谩骂讲史，以片面、歪曲的史料写史，是严肃地对待历史吗？

一、怎样理解孙蓬一 1967 年 4 月 12 日的演讲？

笔者在文中引用了孙蓬一的演讲，并着重指出：“这个讲话点了吴传启的名，并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句话的矛头就是指向了王、关、戚。”因为很显然，吴传启等人不够资格，也没有实力“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成果。”因此，孙的这句话指的就是吴传启的后台王、关、戚。樊对孙的这个演讲没有一句分析，对孙的关键话语更是置若罔闻，一上来就指斥上述说法“咄咄怪事”。那么孙蓬一的讲话，到底有没有不点名地剑指王、关、戚呢？请看孙蓬一演讲的关键段落：

昨天、今天，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的那些人一记响亮耳光！……。据我们所知，他们现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破坏大联合。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他们里面查明了叛徒，起码有五个。例如卢正义。¹

樊既然要否定孙 412 演讲的意义，那么就不能回避孙这个讲演的具体内容，而凭空地下结论。如果樊能不同意我对孙蓬一演讲的解读，那么请你解读一

¹ 孙蓬一的“412”演讲，全文刊登在 4 月 13 日《新北大》校刊。

下以上孙蓬一的演讲。

对笔者的论点，这里再提供另一个重要旁证：聂元梓、孙蓬一于 412 孙演讲前一天，曾在小范围内议论了王、关、戚、谢富治的问题。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4 月 11 日）晚上，我召集了校文革及其他有关的人，有孙蓬一、李清崑、姜同光等（记不清还有谁了）开了五六个人的小会，让他们对当前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讲了文革形势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的问题。受会上气氛的感染，散会后，孙蓬一回到学校，自己召开了全校大会，一股脑地把我向他们讲的问题全端出来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不可能公开地反王、关、戚。王、关、戚当时是中央文革大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公开反对他们便意味着即刻遭到灭顶之灾。即使不点名地向王、关、戚宣战，已然是冒了巨大的风险。（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 年，214、215 页）

再请看聂元梓在《我在文革漩涡中》的相关叙述：

我和孙蓬一在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罢了。孙蓬一公开这么一讲，过早暴露了我们的意图，让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把我们看作是眼中钉，用各种手段压制我们，把我们搞得非常被动。不过，他的讲话也有积极意义，就是公开亮出了反对王力、关锋的旗帜，这样，全北京市以至外地反对王力、关锋的群众组织，都来和我们联系，互通情况，共同战斗了。（第 141 页）

由于吴传启和关锋、王力的特殊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提反吴传启，就会有人说你“反中央文革”。为了组织的安全，我制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不提揪吴传启的后台；不许各战斗队写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许整他们的材料。“除隐患”战斗队整材料时也要有所节制。（第 144 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为着保护自己，

在反王、关、戚的斗争中，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樊先生对此是不能理解，还是有意曲解？

二、时光倒错，无视具体的历史条件

樊文否定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于1967年1月至1968年2月曾反极左、反王、关、戚的证据，竟然是1966年9月时候的事。樊时光倒错玩穿越。完全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脱离时间、地点、条件，任意解释历史，文不对题、张冠李戴。樊引用《新北大》校刊1966年9月2日第三期第一版的文章：

1966年9月2日《新北大》第3期，第一版，《文化革命的里程碑，北大历史的新篇章，我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王任重同志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王任重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前他接受了红卫兵战士代表献给他红袖章、红领巾。第二版《聂元梓同志在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今天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同志，我们对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向他致无产阶级的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樊企图以此为证，说明聂、孙、校文革在北大欢迎了中央文革的王任重，因此表明校文革是支持中央文革的，而支持中央文革就是支持王、关、戚。因此校文革不可能反王、关、戚。这就是樊的逻辑。

1966年9月时，王任重任中央文革排名第二的副组长，分分管北京高校运动。新北大校文革对他来北大表示尊重、欢迎，有什么不正常吗？能不欢迎吗？要示威、抗议、拒绝他来北大吗？这与后来新北大反王、关、戚根本是不搭界的两回事。怎能用1966年9月发生的事去论证1967年2月以后发生的事呢？这样论述，其论据怎能证明论点呢？再说，你樊能廷当时（1966年9月）也没有反对王任重呀！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中共中央宣告设立的机构。1966年9月时，新北大绝大多数师生都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9月时，王任重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北大文化

革命代表大会开幕仪式，刚成立的校文革欢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来北大，这本是个官方程式，很正常的事，并非什么特殊的政治事件，樊却要大作文章。

至于1966年12月王任重离开了中央文革，被揪回湖北当作执行资反路线的走资派被批斗，那是后来的事。后来12月发生的事，同样不能按樊能廷的逻辑，说这表明北大校文革早在9月时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右翼代表王任重的。当时聂、孙没有这种认识。9月到12月虽然仅仅相差3个月，但许多事物变化极大，因为那是个地覆天翻的时代。文革的时间流是飞速发展变化的进程。对不同时间段所处于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必须依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

樊先生的论述方法，无法以论据证明论点，是强词夺理的歪论。研究历史，不可脱离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叙述和分析，不可像樊先生那样任凭主观想像描绘、解释历史。

三、乖情背理的“后见之明”

樊文引用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58期以及4月8日第60、61二期合刊，引用这三期校刊不同版面共六篇文章，内容都是报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响应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新北大师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全校掀起批判刘少奇高潮。樊以此说明聂、孙、“新北大公社”是拥护、支持戚本禹文章的，因此并没有反过戚本禹，没有反对过王、关、戚，没有抵制过王、关、戚的极左路线。樊在此处又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生拉硬扯。

首先，当时毛泽东部署全国文革进入大批判阶段，开展对刘少奇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新北大欢呼戚本禹文章，首先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炮轰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新北大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当年全国、全市工、农、兵、学、商，莫不如此。樊先生与笔者当时也都是随大流，欢呼戚文，批判刘少奇。戚本禹此文，不点名地批判“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戚文开篇，首先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当时报刊上曾透漏：刘少奇曾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这成

为对其开展大批判的由头。

关于此时的文革形势，毛泽东于1967年5月时（戚文发表一个月后），于5月间与外宾谈话中，把戚文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由此可见，当时新北大欢呼戚本禹的文章，是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并不是支持戚本禹个人的特别表现。当时北大师生是紧跟毛主席，而不是紧跟戚本禹。包括樊能廷当时也是拥护戚本禹这篇文章，并无一字一句的批判。当年大家都紧跟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炮轰刘、邓司令部。跟着领袖犯了政治思想性的错误。

神化领袖，迷信领袖，批判刘少奇，这当然是北大师生的历史教训，对此北大师生都应深刻反思，包括聂元梓，也包括樊能廷和笔者本人。当时1967年4月戚文发表之时，北大尚未再次分裂，新北大师生，包括樊能廷所隶属的“零派”“北京公社”也都跟着大潮流，紧跟毛主席，拥护中央文革，欢呼戚本禹的文章，坚决地炮打、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家都犯了错误。认识有个过程，但当时已有一部分北大师生，包括聂元梓、孙蓬一已先知先觉，开始对王、关、戚的极左路线有了初步认识、抵制和斗争。这也是事实。正如哲学家王若水在《聂元梓回忆录》的《序》中所说：

聂元梓在“文革”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立场。她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和那些单纯的、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尽管如此，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不能不追随毛泽东参加“造反”。这

是很自然的，不过到了后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

王若水先生的这段话，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的科学态度。

经过1967年1、2月的夺权风暴，新北大首先和学部联队、洪涛、吴传启等以及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等产生矛盾，并对他们的后台王力、关锋产生看法。对戚本禹产生看法稍晚一些，主要是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后，发现戚本禹勾结学部周景芳，搞小圈子，把持市革会，才对戚有所警觉。此事后文再议。

凡事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研究发展过程，注意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事求是地挖掘历史真相。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樊先生缺少这种科学态度。

文化大革命是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是多种矛盾交叉，多层次、多条路径的矛盾斗争同时开展。复杂的问题必须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历史的全貌。必须抛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才能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文革中，经常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1967年的北大，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主流倾向是广大师生（包括聂、孙和两派群众），迷信领袖，紧跟领袖，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大潮流、大气候，是主要倾向。在此大潮中，聂、孙、校文革和两派群众都犯了错。然而在北大也确实存在一种被掩盖的倾向，即聂、孙、“公社”的骨干队伍，在斗争的实践中，对学部吴传启、林杰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日益反感，并起而斗争。由于吴传启、林杰等人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关、戚，为着保护自己，只能暗反，不能明反，从而成为一种被掩盖的倾向。这种倾向日益发展，到了文革后期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人民群众中反抗极左路线的斗争，终于汇合成各阶层都被卷入的反对“四人帮”，反抗秦始皇统治的滔天巨浪，形成大气候、大潮流、成为主要倾向。天安门事件的大潮流是由此前全国各地反极左的小支流逐渐汇合而成，是由全国各地奔腾于地下的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小支流，逐渐发展，逐渐汇合，终于在1976年3、4月，在天安门广场形成公民抗命的滔天巨浪。从而为“四人帮”的倒台和新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认识有个过程，历史的进程也有个过程。早在1967年北大存在的那股反吴传、反王关戚的暗流，那个被掩盖的倾向，是属于先知先觉的斗争火花，是北大文革史闪亮的亮点。作为思想文化发展史，正视并挖掘这段反抗史，其意义不言而喻。

四、新北大反王、关、戚的历史事实

笔者在《抢救记忆》中列举了大量史料，证实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曾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樊却无视、回避笔者列举的大量史料，闭着眼睛给笔者扣大帽子，说笔者“以论代史”“谎话连篇”“遮蔽真相”，却没有指出笔者的那条史料不实。有鉴于此，笔者只好再次引用《抢救记忆》中的史料，赘述新北大反王、关、戚的历史事实，笔者在《回忆录》第133页至136页写道：

2月中上旬我一回到北大，就了解到在北京一月夺权过程中，北京市在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尖锐矛盾，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红旗》杂志林杰支持下，小圈子抱团抢权，排斥、反对新北大和其他高校。

第一件事是高教部夺权。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下大力量”（引自北大《动态报》）1月19日）。李清崑告诉我，1月18日周总理布置新北大去夺权的会议，他参加了，确有其事。而后北大校文革成立了“校文革夺权指挥部”。随后，聂元梓在周总理指示下，带领“红旗兵团”等北大学生组织去教育部夺权。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总理当时有个指示，“夺权要在本系统夺”，还说“别的学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时，遇到谭厚兰带领的北师大“井冈山”等高校造反派。北大与北师大对支持高教部那一派夺权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因为新北大经调查发现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首，并出卖过同志。当时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而后，谭厚兰、卢正义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这时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明显地拉偏架，选边站。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

的夺权活动……在高教部夺权事件中，新北大的部分人发现《红旗》的林杰、学部的吴传启、北师大谭厚兰、高教部的卢正义这一圈人勾的很紧，上面有王力、关锋支持，排他性很强，很不正派。在尔后的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小圈子抢权的现象一再出现，从而引起人们深思……

关于周恩来当时是否曾指示聂元梓、新北大去高教部夺权一事。有人质疑。当年聂元梓是指示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李士昆二人带队去的高教部。2016年4月29日，李士昆在北京向笔者回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67年1月，聂元梓找我和赵建文，传达周总理指示：现在文革发展到夺权阶段，北大、清华要起带头作用，按系统夺权，去高教部夺权。聂元梓要我和赵建文带队去高教部。”李士昆是此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的记忆当然很重要。（新北大师生去高教部夺权，不能因为有周恩来的指示，其性质就变成是正确的。其性质仍然是响应、执行了毛泽东进行夺权斗争的极左错误。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无论周恩来在文革中内心是怎么想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路线方面，他始终是选择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二件事是1月15日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室被抢事件。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把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抢劫一空。民族学院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及统战部的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听取此事的汇报后，指出此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指示要“追回档案”。令人意外的是，公安部第二天把洪涛、刘郢放了，谢富治以“公安部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说“革命左派接管档案”是“革命行动”。此“1.15”事件后，统战部和民族委员会系统分成二派，一派是民委洪涛的“红色联络站”和民院的“东方红”，他们得到学部吴传启的支持。另一派主要是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交流对北京形势的看法，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此后民院“抗大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成为坚定战友，他们对谢富治都存在不满。

第三件事是1月份两派在中宣部的争执。在陶铸被打倒后，北京市各高校及中直机关各造反组织在中宣部联合批陶，组织了“批陶联络站”。在讨论教育部卢正义所属的“延安公社”能否加入时，发生了分歧，林杰、吴传启、谭

厚兰支持卢正义、“延安公社”加入，新北大坚决反对。林杰与北大“红旗兵团”的代表聂向前（西语系学生）拍桌子大吵……以前屡次显现的那个面貌极左的联盟，再次出来表演，特别之处是第一线后台林杰此次站到了前台。他们那个小圈子联盟，结党营私，到处伸手夺权，排斥异己，并且开始了对持不同意见的聂元梓、新北大、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极力进行打击。

当时从许多“耳语”得知，谭厚兰从北师大毕业后分配到《红旗》工作，与林杰同事，后来谭又回到北师大工作。关锋与林杰也曾是《红旗》同事。关锋与吴传启曾同时在学部哲学所工作过。谭厚兰的后台应是林杰。我当时已怀疑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但不敢说。认为他们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聂元梓、孙蓬一则看的更深入，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已认定王力、关锋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

樊先生，笔者以上所述1967年1月夺权风暴中发生的事，讲述了新北大是如何察觉了吴传启、林杰、王力、关锋搞极左帮派的。这就是“论从史出”。你不可无视以上历史事实，而粗暴地否认从史实中得到的史论。

下面，再看看聂、孙在1月风暴之后，是怎样直接与王力、关锋斗争的，还是让事实说话。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看看1967年3月下旬、4月10日、5月28日、6月1日、6月5日，这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

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这是聂、孙首次上递材料，告状。

4月10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5月28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

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这次“5.28”谈话十分重要，有几点值得注意：1. 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2. 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3. 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4. 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6月1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四天前，陈伯达刚刚于5月28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6.5讲话，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6.5之后，6日至8日短短三天，“井、团、零”脱离“新北大公社”，与5月时的校文革反对派“飘、红”合流，声明要“打倒校文革！”从此北大形成两大派，陷入长期“内战”，甚至武斗的局面。新北大后院起火，反吴传启、反王、关的斗争受阻。（以上1967年3月至6月的北大文革史料，见《聂元梓回忆录》）。

下面补充一下戚本禹的问题。聂、孙、“新北大公社”对戚本禹的问题觉察得略晚。戚本禹把学部的周景芳安插到北京市革委会，成为核心组成员，搞小圈子抢权。

北京市革委会是1967年4月20日成立的，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谢富治的小圈子里，当时，把聂元梓列为主要矛盾。王乃英（林杰之妻）1968年初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材料中，有这样的内容：“革委会成立不久，一次周景芳让我给谭厚兰谈谈革委会内部的形势，即：聂元梓野心很大……其主要矛盾是与聂的矛盾……后来，金吾伦带着谭厚兰到我办公室，让我与她谈。我就周的上述意见给谭说了，后来王世宽也说过。”吴德的回忆录也谈到：“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

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王复兴《回顾暴风雨年代》202 页；胡宗式文章《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

1967 年 8 月 27 日，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9 月 1 日下午，北京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很多，但没有王力、关锋。中央以王力、关锋不出席会议的形式间接宣布他们倒台。于是学生们知道了王、关垮了。

9 月中旬的一天，在学校 28 楼前的马路上，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侯汉清碰见胡宗式，对胡宗式说：“看来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侯汉清这句话，表明他是个胸襟坦荡的人。但他这句话不搞够准确，他说的“我们”应改为“我们井冈山个别头头”，因为“井冈山”大部分群众并没有保王、关，只是有少数人认识模糊，认识较晚。

五、关于“除隐患”战斗队

聂、孙、校文革、“公社”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一个重要史实是“除隐患战斗队”的行动。笔者在《抢救记忆》中写了“除隐患”的事迹，樊先生却视而不见。笔者在该书第五章第 10 节《反极左，反吴传启》中（151、152 页），写道：

6 月 1 日，“除隐患”战斗队用大字报公布了第一批吴传启的资料，把北京反吴传启的斗争引向深入。

“除隐患”战斗队的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这个战斗队直属聂元梓领导，任务是调查北京的那些形左实右的代表人物，调查他们怎样破坏文革，调查他们的历史，挖叛徒。他们是秘密部队，是一支精干的调查队伍，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递交调查报告。那时我和索世晖经常与赵建文见面聊天，赵的嘴挺严，什么也不透露。后来得知，在 5 月时，聂元梓、孙蓬一、赵建文已认定“隐患”就是吴传启及其后台王、关、戚。他们已向中央递交了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洪涛等人的材料。向上递交的材料到吴传启为止，更大人物的材

料没敢整理、上呈。而我们“红梅”战斗队做为群众，当时只认定了吴传启、林杰是“隐患”，往上只怀疑到关锋为止，再往上就不敢想了。

我曾于2016年5月2日拜访赵建文，询问他在1967年9月1日王力、关锋倒后前，“除隐患”战斗队整理并向中央上报的材料中，有没有吴传启以上极左派大人物的材料？他明确告诉我，没有上报过王、关、戚的材料，但整理和上报了谢富治的材料，包括他在市革委会重用周景芳那帮人，结党营私的材料。（见拙著第151、152页。第五章第10节《反极左，反吴传启》）

关于“除隐患战斗队”的历史功绩，笔者再补充如下，聂元梓在《我在文革的漩涡中》一书，专门介绍了“除隐患”的工作：

1967年4月组建除隐患战斗队就是为了搞吴传启们的材料，和他们作战。许多优秀的同志参加了这样的工作。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

队长赵建文（哲学系教师），副队长潘国华（国际政治系教师）。战斗队大约20人，工作颇有成效，自身的安全也做得不错。“除隐患”战斗队，在工作中有严格的纪律，不是什么材料都要，什么人都搞。最高只是搞到吴传启。林杰的材料不整，更别提关锋和王力。关锋和吴传启联名的文章一概不取。这样，不可能从除隐患战斗队抄出整王力、关锋的材料。队员们怀着保卫周总理的决心、顶着二月逆流派的帽子，和王关戚极左势力作斗争。在陈伯达6.5讲话以后，只有一个人造反上了“井冈山”，他没有也不可能揭发出什么钢鞭材料。

“除隐患”工作期间大约整理的材料46篇，大多上报，有些发表了。宣传队进校以后，材料被收走了。现在整理不出这46份材料的清单，是个遗憾。

1967年秋，王力、关锋倒台后，学部的造反派头头王恩宇被对立的一派抓起来了。我们通过联系，参加了学部审王恩宇。当时在场十几个人，北大的两人。王恩宇讲了大量戚本禹的材料，讲戚本禹保卢正义的问题。并且暗示康生也是保卢正义的。但是，当时就很难继续追查下去。

审过王恩宇，回来向我汇报，讲了戚本禹的大量问题。我说，看来戚本禹应该跟他们（王力、关锋）是一伙的。这些材料要不要向上报，我拿不定主意，就说问一问高等军事学院的人——高军院的几个人，在文革初期跟我们关系很密

切，同时，他们有自己的资讯渠道，联系很广。我们有些事情拿不准，就向他们征求意见。我们把关于康生的事向他们讲了，问他们应该怎麽处理。他们就要求先听一听审问王恩宇的录音（学部的人录音）。他们来了两个人。穿着便衣，到了北大十三公寓。结果呢。听到关于康生的部分，录音没有了。他们问怎么没有继续录。赵建文说，敢继续往下问吗？我说：你们说应该怎麽办？他们说，有些事情是要看火候的，要在适当的时机往上报，你往前赶了一点儿，就是反动，你稍微等一等，再报上去，就是功臣。

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见好就收了。“除隐患”也不能继续存在了，因为已经涉及到了康生，你不解散，人家就认为你不只是在搞康生了。追究王、关已经给我们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若是再惹着康生等，那恐怕只会是自讨苦吃。“除隐患”战斗队也就解散了。

到 1968 年 1 月，戚本禹也垮台了。“除隐患”的一个同志，用“迎春到”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布了戚本禹的一些罪行，主要内容是戚本禹如何利用反击二月逆流，来反总理。这可以说是“除隐患”的余音了。（第 218 至 220 页）

六、如何评价北大两派

樊文引述了原“井冈山”校友郑斯宁的一句牢骚话：“有人硬说北大两派的分歧是关于王关戚，活见鬼！”简单一句话，反映了相当多的原“井冈山”校友的心里话。笔者同意许多原对立派校友的这种看法。当时，虽然“井冈山”个别头头（如牛辉林）受学部洪涛等人影响较大（牛常常去找洪涛串连、交流），但大部分“井冈山”师生仅仅是对极左势力的认识模糊不清、后知后觉而已，不能把“井冈山”整体说成是保王关戚及其极左路线的。孙蓬一于 8341 进校后，曾深刻检讨自己把对“井冈山”的派斗，当作是“与王、关、戚路线斗争的继续。”

“井冈山”群众在 1967 年 3 月时（“井”成立前），只是对校文革有意见，要求整风。陈伯达 6.5 讲话是北大分裂的关键因素。

陈伯达为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反王、关的浪潮在全市、全国奔腾向前，于是在北大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新北大后院起火。“井、团、零”受其挑拨，

从“公社”分裂出去，从而陷入“内战”的泥潭并发展至两派武斗。1967年6月以后，“井、红、团、零、飘”日益激进，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把“整风”发展为“革命”，要“砸烂”“打倒”校文革，实行“二次革命”“全面夺权”，从而由“整风”跨进了一步，变成了“革命”，把矛头指向聂、孙、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于是“井冈山”由正确变为错误，并被王、关、戚利用。实践证明：真理向前跨一步，便会变为谬误。

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反极左，发生于1967年1月至1968年2月，其斗争特点是矛头向外，向上。向外，是指对着学部吴传启等。向上，是指向王关戚。1968年1月戚本禹倒台后，聂、孙、“公社”总部，方向变得不清了，上面的斗争目标王关戚没了，外面的学部吴传启等也被关押了。阶级斗争和谁斗呢？于是逐步把矛头转向对内（校内），对下（“井冈山”），认为这是与王关戚路线斗争的继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校文革、“公社”以“捍卫红色政权”为名，信奉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井冈山”实行“镇压”。这样，大方向就错了！同样，“井冈山”也犯了泛阶级斗争化的错误，坚持“二次革命”“全面夺权”，要“砸烂校文革”“摧垮新北大公社”，斗争矛头指向对立派的干部、师生。“井冈山”骨干的头脑，被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统治，要“不断革命”“不断地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不断地推翻当权派”“不断地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断地造反、夺权，认为这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公社是老保”。激进得很！大方向错了！

两派坚持派斗、武斗，大方向皆错。两派互视对方是“阶级敌人”，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泥潭，并发展至武装割据，冷兵器武斗。愚蠢之极！此时，群众运动已步入歧途，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已大失人心，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合法性。于是，毛泽东顺势于7.28派工军宣队开进大学，终止派斗，制止武斗，进入大联合、斗、批、改阶段。从此，群众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孙蓬一于8341部队进校后，对北大派斗及本人的错误有深刻反思和书面检查。下面摘录孙蓬一于1969年下半年的一份检查手稿的部分内容：

六七年六月以后，校内分裂已成定局，终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反对我们的五个组织，八月间成立了井冈山兵团。我对井冈山兵团的态度，一直

是错误的，一直拒绝承认人家是革命群众组织。除了九月底在全市大联合的高潮中，曾有过联合的愿望外，以后就在“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口号下，一直顽固地坚持对井冈山兵团实行吃掉、摧垮的方针。当时我们有过明吃、硬吃或暗吃、软吃之争。我是主张明吃、硬吃的。对主张联合、承认人家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我统统视为“不坚定”“右倾”而加以排斥、拒绝。把自己的派性顽固性当成是什么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架势，真是好像“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似的……

中央文革揪出了王、关、戚之后，本来为我校的大联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时，本来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方法，首先是校文革向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做认真的自我批评，然后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现在想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革命大联合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可是这时，我自己的尾巴都翘的很高，以反王关戚“有功”自居，更加顽固地坚持吃掉、摧垮的错误方针。我把井冈山兵团受王、关、戚的某些影响，夸大为井冈山兵团受王、关、戚操纵，用以攻击对方。

今天看来，问题很清楚。井冈山兵团中和王、关、戚集团的人有过来往的，只是极少数人，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至于井冈山兵团的群众，如果有些同志一时看不清王、关、戚的面目，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王、关、戚他们那时还窃据着中央文革成员的要职，他们的罪恶活动，多半是背地里干的，为群众所不了解。群众出于对中央文革的热爱而说错了几句话，决没有理由抓住不放。对我校两派革命群众来说，对王、关、戚问题的认识只是个有早有晚的问题。以我自己为例，在六七年一月以前，对吴传启的面目就毫无认识，我那时还在群众中说他是左派，对他表示支持……当王、关、戚被中央文革揪出来以后，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和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一样，同样是坚决反对他们的。

……

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公式是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

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而我却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常把对敌斗争的公式，用来作为处理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的指导思想，主张所谓“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对制止武斗有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把它和战争混为一谈。把战争必须用战争来消灭，错误地引申为“武斗只有用武斗才能制止。”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在武斗期间，所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

……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廿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 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 36 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 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的 4.26 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伟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本来应该使自己清醒起来，可是，资产阶级派性已使自己的头脑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4.26 以后，我们进而又把井冈山兵团围困起来，使许多在圈外的同志没有地方住，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被围在楼内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围在楼里见不了阳光，还给人家断粮断电，甚至企图断水，所受的摧残则更严重。而我当时，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还把这种局面看成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被围在楼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今天就更清楚了，是我们的革命同志，……请这些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判！

孙蓬一磊落地承担了北大武斗的重大责任。他的检讨，真诚、深刻、实事求是。对原“公社”的校友们认识两派“内战”的教训，很有启发。

结 语

回忆、反思、总结文革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在回顾文革时，两派校友应各自反思、总结本派错误，告别派性，走出文革阴影。唯如此，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教训。万分遗憾的是，樊能廷回忆北大文革的文章，对本派从无一言自我批评，总是以讨伐、贬损对方为己任，总是牛哄哄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樊文为笔者纠错的题目是“北大文革史怎样写”，此文就是对樊先生的回答。■

2020年10月9日

【评论】

刘家驹遗著读后

——《光荣的背后》启示录

方延曦

阅读《光荣的背后》这本书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总算坚持着读下来，不禁掩卷长叹！最强烈的印象与感觉是：满目的血腥与残忍！长达70年的时间里，历史真相一直就像月亮的背面，现在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这也许就是它被长期掩盖的原因。它不能见人，因为它实在太可怕了！

现在，一位年近九旬且已故去的老共产党员、老新闻记者刘家驹在临终前把这些陈年旧账翻了出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在《背后》书稿《后记》中这样说：

“我留下约70余篇不能问世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经历和见闻。我希望读者能从中领悟到一个‘两头真’老人的心声。”

“我原寄望某领导人会站出来对本党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事件作出公开的、诚恳的道歉，让我党出现生机，走向民主大道，可至今执政的衮衮诸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勇气，他们担心一说就垮台。”

“‘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党的三大法宝。讲真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是我党念兹在兹的庄严承诺。篡改、掩盖、歪曲党史军史真相，是对国家的失职，是对民族的伤害，是对人民的犯罪。

我曾渴望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良知发现，向国人作出深刻的忏悔。然而，期望、失望，最后变成了绝望。“

刘家驹老人于1949年以高中肄业的学生身份参加了革命，2017年去世，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68年。从朝鲜战争算起，伟大导师发动的几乎所有运动他都是亲历者，他又是秉承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书写，这就让他的这本回忆录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感。他在叙述历史事件时，特别用心地描绘了一些大背景下与他同生共死的小人物的命运，而使得这本书稿更具有人道主义的温度与高度。

其实，革命的残酷性人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耳闻，特别是文化革命中的种种惨剧就发生在身边，但是像刘家驹老人揭露出的那种残酷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经验。

书评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复述原书中的具体情节，那样做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读者可能连书评也看不到了。

可我为什么还是要写这个书评？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因为我就生在这个时代、就长在这片土地上，我来了，我经历了，我看到了；我不能装着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发生，我不能。

像我这种“四零后”和比我们小一些的“五零后”，都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我们之前出生的人，大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六零后”“七零后”就差一些了，而“八零后”及更晚出生的人，对那个时代就没有亲身感受了。如果我们不写不说，那历史真有可能就烂在肚子里了！历史要从我们手里消失，这样的后果想想就让人害怕！

同样让人害怕的是，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些人，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确有许多年轻人为疯狂年代背书，因为他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情有可愿。而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这样做就不能原谅了。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害怕，为了自保，但这岂不是从反面更加说明那个时代的可怖吗？心有余悸啊！

我反复想过：说，还是不说？我的决定是：说！

为什么？想起了古老中国的传统教育，其中包括革命的传统教育，眼前仿佛站起了文天祥、谭嗣同、方志敏、叶挺、刘胡兰、董存瑞、林昭、张志新，……

他们都是先烈，他们都是为寻求真理而英勇赴死，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

伟大导师不是也曾这样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说得多么好！

再说，笔者本人如今也已是七老八十、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了，人生所剩无几，还有什么怕丢掉的吗？

伟大导师也曾要求我们做到“五不怕”，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说得多么豪迈！所以，无论是去“见马克思”，还是去“见上帝”，如果我们仍然放不下可耻的私心和可怜的胆怯，那我们对得先烈吗？对得起伟大导师的教导吗？那我们还算是人吗？

于是，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光荣的背后》都有哪些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并且永志不忘。

人血不是水，人民的鲜血不应该白流！

为叙述方便，以下文中提到《光荣的背后》一书时都简称为《背后》。

【述往】

我参与过抄家偷书

安希孟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实实在在地说，文革作恶的绝不是四个人，万千群众你我他都曾经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1966 年八月，红色恐怖，骂狗崽子斗黑帮抄家游斗黑帮。有一天，我们系高年级学生抄黑帮的家。我们闻讯，同宿舍的一位好朋友说我们也去看看。二年级学生查抄潘环怀老师和胡明的家。潘环怀老师是讲师，不知道她是什么黑线上的人物。潘老师家没有什么黑材料，只有精美相册。我和同班同学对于抄家是外行，没有经过事先训练，只是翻看书籍，偶然间见到相册，潘老师说，那是女儿的，女儿神经衰弱。我们很知趣地放回原处。其余的事儿忘记了。其

他高年级还继续查抄。不知道搜查出什么，反正后来系里珠宝首饰一大堆，有一位革委会负责人还贪污了几件。足见珠宝金银首饰貂皮裘衣不少。后来北京展览馆红卫兵战果成果展，展览黑帮材料，大概这些都是罪证。那个岁月，没有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保护，没有隐私，没有个人利益。后来工军宣队进校师生混合编班，见到潘环怀老师，一个战壕的战友，同事啦，我们也没有任何内疚，没有愧疚之心。人的脸皮通常是很厚的。

同一个上午，我俩又随着高年级同学进入胡明老教授家，胡教授翻译了不少高尔基小说，都是泛黄旧书。书橱里一股樟脑味和旧书霉味。我觉得恨恨不已，只嫌没有什么反动大毒草。捉虱子心态。好像豺狼虎豹总想猎获肥硕猎物。我那时是希望北师大多揪出一些知名教授，越有反动“罪证”越过瘾，自己才觉着上名牌大学自豪。后来胡敏先生从二楼跳下身亡。我们没有一丝内疚。可耻。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何万福被批斗争后，于1966年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自尽。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教授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9月5日，俄语教授胡明在校园中教工宿舍楼“工一楼”（位于北师大主楼北边）跳楼身亡。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的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妻子也在同一时期在一天夜里一起跳楼身亡。第二天早上，邻居在楼下看到他们人在血泊中，身上盖着一张席子。

北师大石盘教授，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石盘先生是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917年，原名孙洪钧、孙习礼。1938年，石盘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

1966年8月18日，石盘教授在校部主楼七层自己的办公室窗口，纵身一跃。1980年1月3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石盘教授追悼会。北师大新老领导聂菊荪、何锡麟、马健民、王正之、任炎等参加追悼会。石盘生前朋友陆定一、周扬、曾三、于桑、赵苍壁、余修、于光远、胡绳、熊复、张仲实、梅益、廖盖隆、叶蠖生、陈道、谷羽、秦川等，或送花圈，或亲临追悼会。

1966年八月的一天晚上，暑气蒸腾，北师大二附中的娃娃们忽然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骂“他妈的”，一个女孩子说北师大的臭大学生“绘画绣花文质

彬彬”，是臭大学生。据说二附中如火如荼。晚上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去师大对门二附中取经观摩，人潮涌动。只听帆布蒙蔽的教室里教师们惨叫。鞭子抽打，凶神恶煞。我班一位同学从窗户跳进去，对和自己无冤无仇的老师大打出手。我和这位同行的同学心里很沉重，默默回到学校。■

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安希孟

认识了一个人叫叔本华。1970年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有一次，北师大外语系在文史楼108阶梯大教室（有的数字终生难忘）开会，上下推拉式巨型玻璃黑板上赫然写着“叔本华”仨字。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来是政教系老师辅导报告批判“唯意志论”。仿佛隐约知道是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那时候，唯意志论就是唯心主义。这些知识可能就是批林整风后来陆续知道的。不料一个外文系毕业的学生的我，后来竟然以讲授叔本华意志哲学为业，而且还可以读出“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9-1860”。你年轻时的知识，有的终生不再理会。然而有些知识，却不知道要用一辈子。后来毕业分派到银川，批林批孔，市教育局让老大学生讲解儒法斗争，我也跟着学了些中国哲学史知识。

上世纪七〇年，我在北师大接受工人叔叔再教育，被贬谪到北师大后勤处劳动，修理沙发桌椅板凳。有一天到主楼八楼原北师大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搬运弹簧椅修理，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发现乱七八糟仓房里文件柜上散落着一堆发霉纸质书，是文革抄家残留物。傍晚钥匙未归还，晚上我偷偷溜进主楼——整楼八层空空无人，也不怕鬼——偷了几本书。其中有王力《古代汉语》，苏联敦尼克《哲学史》，文革前“简易版”。没有封皮，只有内瓢。这对我们也足够了。

现在察知，此书书名《哲学史》，敦尼克等著，三联书店，1962年版。有了这个基础，后来报考研究生，居然大言不惭地报考西方哲学。泰勒斯，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斯，我相信知道这些名字的人不会很多。后来到了银川二中又见到《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上下册，是从这本厚书中选印的。现在告诉大家，我那时窃为己有了。《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上、下册，敦

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米丁、特拉赫坦贝尔。三联书店，1972年。

书堆中还有适合我小学水平的弟弟学习的“知识”。我笃信开卷有益，比如样板儿戏的剧本彩照书卷连环画小人书，我都细大不捐，一体购读。

我在后勤处劳动期间，还发现了四清、社教时的忆苦思甜小册子，内容是地主富农压迫剥削贫下中农。这些也是抄家所得。这些，连同购买的八个样板戏连环画，我也作为文化知识书籍，寄回老家让弟弟妹妹认字长知识。我相信这有助于家人文化知识学习。

我在北师大后勤处房产科和作战部偷拿的书，大部分是阶级斗争教育，斗地主纪实，控诉万恶旧社会，控诉地主富农，反对封建压榨，歌颂新社会，赞颂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书按印刷品寄回山西南常，只需牛皮纸包裹，邮资仅三分。

文革首长包括王关戚讲话，我也尽数寄回老家给哥哥，鼓动革命。也是敬惜纸墨呀。油印材料，传单小报，也不管是武汉的三钢三新，天津的大联筹，天派地派，随便炮打谁，一律免费搜求，来者不拒，一概寄回家中，都是开阔眼界，学习知识呗。

1969年拿工资(薪水)后，别的同学购置新衣皮鞋手表下馆子，我却接济老家弟妹，还特别在意购书刊寄回南常村。那时的小人书，无非是八个样板戏，智取奇袭，全北师大只有我一个人十分用心地给老家弟妹邮购全套此类连环画册，一本不落。我终生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后来在银川，凡所高考复习班油印试题讲义，免费索取，我都卷成卷儿寄回老家供那个参加高考的人作题备考。我的弟弟学问多大，我不得而知，但督促彼等读书，在我是肝脑涂地。连我也说不清，何以让弟弟们看这些书就长知识。

不过与此同时，还淘宝似地偷拿了一大堆半文言体旧线装书，中华文明老古董，明清时代记载乡土风物。可惜毕业分配落在宿舍床下，浑然忘记。内容有番茄黄瓜芝麻西瓜何时传入中华。

劳改期间，认识地理系东北籍顾姓同学。他知识面广，给我借来印制精美的仿佛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天文地理科普书。受其启发，我后来阅读了科学史书籍，遂对科技史略有涉猎。后来阅读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

就有了基础和兴致，颇觉得游刃有余。后来我竟拿到科学与宗教的国家社科项目。

当然了，系里公家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关于样板戏的评论，我几乎尽数掠为己有，剪辑张贴为剪报。我从哪里专门学习词汇。

我爱书，养成阅读习惯，很重要——偶有例外，高中“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所见所闻”，我就批判了“开卷有益”和“知识就是力量”。自己个儿觉得挺能领风气之先，绝代风华。不过，后来也知了，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之新贡献，也非其精华神髓。

北师大外语系资料室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 1964 年意识形态批判关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资料，是我当时所能获得的有关欧洲思想史的资料。我私自偷藏，只剪辑一部分留下。

在北师大，或者说，一般而言，大学生活，课堂上得到的知识其实是很小一部分。我关于普列汉诺夫、赫胥黎传布达尔文进化论的书，不得自课堂。北京西四新华书店内部书，王府井书店，琉璃厂中国书店，我常光顾。

还有一个笑话，北师大外语系我们年级一位小姐，去王府井中国书店淘宝，低价购得一大摞英文《北京周报》，回家一看，是法文。因为法文北京周报，与英文形似。嘻嘻嘻。

我到银川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就主要参考敦尼克书。作战部查抄之书中亦有一册《外交史》，此书未引起我的兴趣，后来世界历史知识储备足够后，方知国际关系外交邦谊谈判媾和始于欧洲。马基雅维利这美丽的名字，也是后来知道的。可惜此书已不知鹿失谁手。一本墨索里尼传，也未引起我的兴趣。这是后来吴振明告诉我说我有这本书。

1971 年有一次在文史楼 108 开会，黑板上有“叔本华 Schopenhauer”仨字，板书极工整，就在我心中激起涟漪。那一定是政教系某老师批林彪唯意志论。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林总也没关系呀。况且意志主义也不是恣意妄行胡作非为，乃警醒世人发扬蹈厉！大锅饭土高炉一平二调乱挂共产风，分明是中华特有亚细亚生产方式。

“修辞立其诚”。我一直醉心于文章语言华美畅达，与这些书都有关系。

不懂修辞的是工宣队，他们说彭真曾拟北京街道路面底下一律铺设电阻丝，下雪马路和电炉一样融冰，断无积雪——乌托邦。今天北方积雪严重，也没见电阻丝。看来这是“戏说”。某工人师傅宣读“冶金部”文件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说还要批判“二类三类”骗子。看来应该有知识才行。欲有知识，就得读书。

文化革命中北京师大井冈山革委会掌握了最权威的未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一共印了八册，无偿发给大家。我很遗憾，这八本书，1980年我决绝地当做废品卖掉了，至今遗憾——不是钟爱。文革我的大字报经常套用毛泽东金口玉言。有一次开会，我说，“现在十点钟，开会”（学毛泽东话），大家哄笑。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一次我的讨伐大字报用了毛泽东“你们想逃到月球上吗？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的句段，告诫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气势很大啊。那是毛泽东替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的告国民党蒋军同胞书。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雄文还有评艾奇逊司徒雷登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笔力雄健还有胡风反革命材料按语，这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我能背诵毛泽东关于武训传红楼梦的信，以及《我的一张大字报》，等。

在北师大，我偷书之外还有抄书。文革有一本书，不是毒草，可以传看：《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其中有个幽默，说赫鲁晓夫视察养猪场，和猪合影。照片说明“赫鲁晓夫和猪在一起”“猪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后来总编机智，改为“左起第三是赫鲁晓夫”，侮辱人格，多么无聊。你一定觉着好玩。不过这么糟蹋人，会使一个民族整体堕落。你对同胞邻人自己阶级弟兄就会必欲侮辱而后快。不能怂恿国民侮辱敌人（况且赫鲁晓夫也不是敌人），这样的后果是林彪、刘少奇、江青的人格也得不到尊重。我用一个新本子抄录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一些章节。按当时我的心态，是不许别人说斯大林不好的。我班的女同学，我的粉丝，也从我的本子上转抄（哈哈，手抄本，那时就有啦）。

■

【文摘】

请为“人性论”平反摘帽

——从毛泽东怎样批判“人性论”说起

张显扬¹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提法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

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展开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没有人可以给它作什么判决，带上什么帽子，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我这里说的“人性论”，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它并不是什么哲学体系，也没有试图去解释历史。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一个观点：认为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性。就是这么一个观点，被毛泽东判定为“人性论”，带上“抽象人性论”的帽子，宣布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此，“人性”便成了有害而危险的东西，致使人们“谈人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谁要是一不小心和“人性”占了边，那就非遭殃不可，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当然成了一个案子，而且至今没有平反。

毛泽东对“人性论”的判决，源出于 1942 年 5 月他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人性论”，是这个讲话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整个讲话的灵魂所在。他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以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观点问题，都以此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人性等等。”（1）

这个讲话对当时和其后中国的文艺工作的影响，以及今天应该怎样看待它，这些不是我所要评论的。我要说的，是它对“人性论”的批判。为“人性论”平反摘帽，不能不从这个源头说起。

¹ 张显扬（1936--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原研究员，1978 年~1979 年，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毛泽东。1987 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晚年致力于写作。2013 年 9 月 18 日，因心脏病病发在北京去世，享寿 77 岁。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毛泽东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但他又不想承担否定人性的恶名，于是就求助于诡辩。先肯定有“人性这种东西”。接着就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2）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就用这种手法，绕了一个圈，把刚刚肯定的“人性这种东西”给否定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毛泽东这段话，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批判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段话除了表明他在人性问题上极左的“阶级论”，即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而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逻辑上的混乱，简直可与“飞者入池而棺槨异处”（3）相媲美。论战手法也不甚光明正大，处处不离诡辩。

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是根本错误的。人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有“具体的人性”，也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既有“带阶级性的人性”，也有“超阶级的人性”。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人性也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大而言之，包含三个层次，即个别、特殊和一般。单个人所具有的人性，是人性的个别，即真正“具体的人性”。具体的人性，内含两个层次的“抽象的人性”。从一定社会群体如阶级、民族等等层面上加以抽象，可以得到“带阶级性的人性”“带民族性的人性”和带其他特定社会群体特点的人性；这是人性的特殊性。从“人”这个族类的层面加以抽象，可以得到超越人的一切具体规定的共同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普遍性，或人性的一般。

毛泽东断言“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但他既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具体的人性”，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抽象的人性”。他认为“带阶级性的人性”，是“具体的人性”。其实“带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的人性”一样，都是抽象的，只是抽象的层次不同。真正“具体的人性”，是单个人的人性，即人性的个别或人性的个性。对此，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到，可见，具体

的个人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超阶级的人性”，即人性的普遍性或人性的一般，尽管是抽象的，却和“带阶级性的人性”一样，是实实在在地存于“具体的人性”之内的。毛泽东借口它是抽象的，就否定它的存在。可见，他对“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不甚了了。在他那里，只有“阶级”和“阶级性”是实在的和重要的，活生生的个人和普遍的人性，都是不存在和不重要的。

讲人性，真正的意义，在于确认每一个人和整个人类都有人性”。只有确认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把人当人，才能理解和构建人与人之间合乎人性的关系。无视人性的个别性，否定人性的普遍性，等于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主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野蛮的“丛林原则”。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动辄把人往死里整，哪怕是亲密战友，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也决不手软，就是野蛮的“丛林原则”的表现。

按理，毛泽东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个道理他不仅说过，而且写过书的。但是，为了否定人性，为了用“阶级性”取代人性，他不得不背叛自己，迫使自己辩证的头脑，去作形而上学的思考：一方面拿“带阶级性的人性”冒充“具体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个别；另一方面，又用“带阶级性的人性”否定“抽象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一般。这就是说，他在个别和一般两个逻辑环节上都错了。

从“需要”看人性的共性和个性

人性的一般和个别或共性和个性，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察。这里，我们仅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上，来考察一下人性的共性和个性。无论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还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是人，就有这五种需要，皇上是这样，乞丐也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般性，人性的共性。但是，这些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对满足与否和满足程度的自我评价，则是具体的，皇上和乞丐大不相同。这是人性的个别，人性的个性。

以安全的需要为例。住在深宫大院，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护着，皇上还未必感到安全，而乞丐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会有安全感。又比如尊重的需要。对于皇上来说，不给他下跪，不山呼万岁，他就觉得不够尊重，

就要治你的罪。而对于乞丐来说，只要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并施以小小的援手，他就觉得受到了尊重，至少不会觉得受了屈辱。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分不开。乞丐不具备皇上的条件，他的想法，他的需要，自然不可能和皇上一样。这既是人性的具体性，又是人性的社会性。

说到人性的社会性，那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毛泽东只把“阶级性”当作人性的社会性予以肯定，是很片面的。别的且不说，人类的存在，至少已经有 500—700 万年的历史，阶级才存在几天？而且根据他所服膺的理论，阶级终究是要消灭的，但人类还将存在下去，从而人的一切社会性也将存在下去。怎么可以把人的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呢？

三个匪夷所思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用他的“阶级论”和“人性论”相对立，毛泽东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三句话，看起来很雄辩，其实三个提法都不能成立。首先，说某某“阶级”的“人性”，是概念上的混乱，甚至语法也要提出抗议：这叫形容词和名词错位。任何阶级，无产阶级也好，地主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作为“阶级”，都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人性”是人之为

人的本性，不是阶级之为阶级的本性，因此只能说这些阶级的人有人性，而不能说这些“阶级”有人性。

其次，谈人性，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什么“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也毫无道理。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阶级，作为剥削阶级，不排除它们有某些共同的阶级性，但决无所谓无共同的“人性”。而且，这个说法，明显地和自己所说的“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相矛盾。毛泽东急于用他的“阶级论”把“无产阶级人性”同“地主阶级人性”“资产阶级人性”对立起来，无意间竟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锅煮了。结果走向反面，把“阶级论”变成了“超阶级论”。

第三，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他还造了个“人民大众的人性”。“什么是人

民大众呢？”他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即“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这就是说，“人民大众”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由三个不同阶级构成的政治联盟。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怎么会有共同的“人性”呢？说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和说“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一样，等于说我们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一会儿说“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会儿又“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他一再地自相矛盾，自己居然没有任何感觉，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曾经被视为经典的毛泽东对“人性论”的批判，就是这样。这里除了否定人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否定一个真理比肯定一个谬误困难得多。强词夺理，终究要露出破绽，不能自圆其说。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竟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六、七十年，岂不哀哉？

“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

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地否定人性，批判“人性论”，和他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分不开。当然，也和那时候莫斯科操纵的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文化思想路线分不开，更和本人否定人性的实践分不开。这里我们只从理论的角度作些追溯。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想的层面，也就是在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它主张自由和人性。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几年前，英国曾经把马克思评为世界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入选的理由，就是他对人类怀有崇高的人文关怀。在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就是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主张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和剥夺。至于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向左的蜕化形态，理想的成分极少，暴力和专政极度膨胀，阶级斗争笼罩一切，根本没有自由和人性存在的余地。

待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传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曾彦修先生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手里，列宁主义的左倾蜕化又大进一步，马克思主义

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充满人道精神的奋斗目标，被实现目标的途经和手段所代替，途径和手段本身成了目标，剩下的只有阶级斗争、暴力和专政。在他那里，自由和人性，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想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我曾经做过一个粗俗的比喻：它是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没有走多远，就拖死一大片。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以及我们不便指名道姓的其他社会主义，在引领人们走向“理想境界”的过程中，在建设“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之后，主张自由和人性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最典型的，是年轻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他因为在 1942 年 3 月，分两次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表示不满，就被打成“托派”。第二年被逮捕，关押 4 年之后，1947 年在撤离延安的路上，被用大刀片（为了节省子弹）砍下头颅，时年 41 岁。一个鲜活的充满人性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王实味是毛泽东确立话语霸权以后，为自由和人性殉难的第一人，但决不是最后一人。

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这曾经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的一切理论、方针、政策，都以此为基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再不被当人对待，就要受到非人的待遇。一搞政治运动，就会发生无数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样残酷的事情。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根子就在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政权，如果连人性都否定了，那么，凭借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

“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现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人性的言论已经不多。但是，几十年来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的流毒并未肃清，对这种蛮横无理的批判，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因而这种声音至今没有绝响。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这本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可是官方理论家们在解释的时候，却还是拼命地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还在使劲地批判所谓“西方的人本主义”，认为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服务的。”（5）

多少熟悉一点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聊无新意。就算批得都对，总也不该抹煞“西方的人本主义”肯定人性、把人当人看的合理性吧？再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吗？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曾长时期地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也不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虽然遵守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写进去了，毕竟表示原则上是承认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对我们这个东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过多大影响；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时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它，不是无的放矢吗？难道“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的极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吗？倡导“以人为本”，不去发掘和继承有关的思想资源，反而去糟蹋这些资源；不去清理自家门里的垃圾，反而继续把它们当宝贝捧着。这算是什么“宣传思想路线”，什么“舆论导向”？

既然决意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那么，把“以人为本”的“人”，用“民”即“人民”来偷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我很奇怪，这些理论家该不会不知道“人”和“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吧，怎么连一句过渡的话都没有，就径直从“人”蹦到“民”上去了呢？如果“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那何不直截了当地说“以民为本”？如果“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那它还有资格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新的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吗？这样的意思，“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人民服务”“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早就说过了吗？

把“人”改为“民”，一字之差，面目全非。人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

度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主体。“民”只是人在政治上的一种角色，一种身份。他一方面与“官”相对待，一方面与“敌”相对立；而“官”是“民”的领导，自然也属“民”的范畴。这样一来，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人便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或者人民，或者敌人，除此而外，再不是别的什么。这种“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其实正是以往几十年所遵循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那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是“革命人民”，就是“阶级敌人”。如果谁不幸被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臭（老九）”的行列，那么不管你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士兵、将军、元帅，甚至国家主席，都再不被当人对待。这样的历史，殷鉴不远，难道都忘记了吗？

提出“以人为本”，从治国理念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原来那种思维定势，把人从“人民一敌人”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使他回归到大写的“人”。承认人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从而真正把人当人，做事情想问题，都以人的利益为重，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的思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果真照此办理，就可以省去许多血腥的争斗，不折腾或少折腾，避免或减少国家民族的痛苦和灾难。可是，经这些理论家一解释，一切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肃清批判“人性论”的遗毒，至今仍然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任务。

“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

把承认人有人性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予以否定，是受了上面所说的“阶级论”的误导，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而且首先是“人”这个族类的成员；不承认各种社会身份，其中包括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都是从人这个实体派生出来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就不应该把这样的观点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称之为“抽

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期以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不摘掉“抽象”这顶帽子，“人性论”不可能名正言顺。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和交流。因此，凡是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和绝对的个体，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老人早就说清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它们是单纯的感觉，无法抽象，所以也不能言说，只能靠相同的体验互相沟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离不开抽象。抽象既是科学形态，又是科学方法。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认为抽象的东西都不能成立，这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试想一下，如果人性和“人性论”因为“抽象”而不能成立，那么其他一切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上“数”的概念特别是“0”概念，物理学上“力”的概念，生物学上遗传和变异的概念，等等，不也是抽象的，因而也不能成立吗？进一步说，哲学上那些概念，包括所谓“唯物论”“唯心论”，等等，岂不是更抽象，更不能成立吗？就说“阶级性”吧，毛泽东以为“阶级”和“阶级性”是具体的，其实，正如上面所说，它们也是抽象的。

人有人性，物有物性，这在耶稣纪年之前，哲学家们就指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真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物性论》。他用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人性、物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探讨了灵魂和肉体，研究了山川大地，向人们证明，“自然用事物的始基（原子）创造一切，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7）这就是用思维的力量，对万事万物进行抽象得出的结论。他讲的这些道理，今天看来，尽管比较朴素，但他毫不含糊地肯定人性、物性，比现今那些根本否定人性的人，要高明许多。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对外正在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对内理论

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无批判地接受这一切，把它作为自己写作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而且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他还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一点也不排斥人性的东西的人。”

（8）有这样的思想，很了不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哲学为职志的人，怎么可以连人性都不承认？真是罪过。今天，我提出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反省和检讨。

极左的“阶级论”已经走下神坛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想用人性去说明社会，解释历史，那当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去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当然不是没有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是，决不能否定人性。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外，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上帝”，或者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抹煞和否定人性的历史，一定是血腥的历史；抹煞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这类历史，我们不仅听说过，而且亲身经历过，许多人还为之牺牲了性命。但愿今后的历史，能够和人性同行；写出来的历史，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

同时，作为个人，我们不管做事还是想问题，首先都要想到自己是人，然后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像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再做事；做不好人，也做不好事。当年有一位人称“左王”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动辄就教训人说，“共产党员不管在哪儿，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人。如果把人的观念、人的意识抛在脑后了，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意

义？现在有些手握权柄的共产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挪用公款，转移黑金，包养二奶，出境赌博，勾结黑帮，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这当然是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但首先是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人性的。人们在痛斥这些败类的时候，常常愤怒地质问他们：“你还是人吗？还有点人性没有？”可见，什么是第一位的，人们心中都有数。但愿我们的官员、党员，能和人性同在，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人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主要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人性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上帝和君王的抗争。我们国家，在古代，孔孟诸子，也有不少人性论思想。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夺取政权以后，人性论的对立面，主要是上面所说的“阶级论”。毛泽东是这个“阶级论”的最高权威和首席发言人，他言必称“阶级”。“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9）这就是他的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阶级斗争史观”。他之所以那样蛮横地反对“人性论”，从理论上讲，根子就在这个“阶级斗争史观”。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 30 多年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已经大变。毛泽东的这个血淋淋的历史观，已经随他本人一起走下神坛，现在连主流话语中也很少提到它。作为“人性论”的主要对立面，给“人性论”戴上“抽象人性论”帽子的这个最后根据，已经失去往日的权威，不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这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思想解放的结果。

因此，我认为，现在该是为“人性论”平反摘帽的时候了。实际上，已经晚了，让那些因“人性论”而获罪致死的人，在九泉之下等得太久了。❏

【读者来信】

1. 张晓良纠错

第 282 期，第 31 页 1 行，评陟事件，应为：评鹭

第 75 页倒数 6 行，反对开枪，应为：开枪。❏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

